1

实际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的历史脉络，在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圈80%是已经有共识了，也就是对于哪些日子发生了什么。基本上大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无论是自由派学者（秦晖），还是左派（北马、水陆洲）等，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身没有争议。争议的地方在于解释，尤其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种种行为的解释。

在mhyyyy先生的视频里认为自由派普遍反文革，但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实际上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恰恰是造反派。在YouTube上，秦晖的文革讲座还专门用了大量篇幅来给造反派正名，提到很多屠杀实际上是保守派做的。

所以，我决定首先来大概用我自己的角度梳理一下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历史脉络（也就是细节上会一笔带过且可能有无数疏漏和错误）。

同时在文章最后解释”自由派知识分子“、”改革自由派”、“毛左派”、“毛右派”、“邓小平”、“西方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叙事。

本文并不是绝对原创作品，只是我个人的读书笔记。
“”“”“ —” “ ”“”“ 《》《》《》 《 》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文革的四种叙事”等原始段落作为我个人的论据，遇到一些较有争议的史料作者看法，我会尽可能回避。
回避不了的我会尽可能把各派观点都阐述一次，涉及到引用的部分，我会使用【】符号

以下为正文：
要想了解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明白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十七年体制”社会（1949-1966）是什么样的。说难听且严重点，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
而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自由派都有大量的论述与抨击。

在当时城乡社会有着严苛的割裂，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的干部，你作为一个农民想要到城里，甚至买票坐火车坐飞机都是需要官员开证明授权的。

此外，当时社会上还充斥着出身论与血统论，你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出身的子女，那么你在社会上可能会遭到歧视与不平等待遇，入党参政会遭受更多的审查。而红色干部家庭出身的红二代们则是血统高贵，用江青的话来说就是“小贵族”

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干群矛盾与阶级矛盾极端严重，尤其是在大跃进的失败、三年自然灾害、地方干部的不作为（如吴芝圃、李井泉、曾希圣），和反右运动等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四清运动对基层的整肃后，整个底层群众（实际上反而由相当的黑五类组成）和知识分子对官僚特权充满怨气，干部与干部之间利益矛盾重重。

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黑五类恰恰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的组成部分，造反意味着反对当权的干部、官僚。而红二代家庭、亲近干部的群众则以加入保皇派/保守派红卫兵居多，“保皇”就是保卫文革前的各级党政干部，或保卫军队。因此当时保守派/保皇派红卫兵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攻击往往会说他们代表着“地富反坏”，是“狗崽子翻身”、“国民党还乡团”。

个人习惯性把文化大革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1968 造反

毛+中央文革+林彪+造反派 vs 刘少奇为首的旧官僚、开国元帅、保皇派

第二阶段：1968-1971 镇压

中央：中央文革/江青集团 vs 林彪集团

地方：军队+保守派+官僚 vs 造反派 vs 激进造反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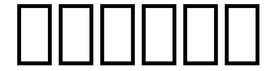
第三阶段：1971-1976 复旧

中央：江青集团 vs 周恩来

地方：旧官僚 vs 革委会造反派

以下为目录：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血统论、造反与夺权（ 1966—1968 ）
1. 白色恐怖五十天
2. 老红卫兵与血统论
3. 炮打司令部——造反派的崛起
4. 工人造反派夺权狂潮
5. 二月逆流——大闹京西宾馆、怀仁堂
6. 军队摇摆不定，陈再道勇救落水老人
7. 革委会的建立与造反派的失势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军事极权（ 1968–1971 ）
1. 反复旧的失败，革命的结束。
2. 清查五一六
3. 极左派、异端造反派知识分子的短暂抵抗
（ 1 ）“北决扬”案：极左派造反派
（ 2 ）省无联案：极左派造反派
（ 3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事件：
（ 4 ）“李一哲”案：温和造反派



4. 一打三反：林彪、中央文革镇压案例：
5.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复活，林彪集团的红色（白色）恐怖
6. 林彪集团的倒台
（ 1 ）枪杆子与笔杆子：林彪派与江青派的分裂
（ 2 ）陈伯达炸平庐山
（ 3 ）毛泽东南巡倒林，林彪叛逃
7. 林彪身后：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新瓶装旧酒（ 1971–1976 ）
1. 坠毁的革命
2. 斗争双方的重新洗牌
3. 马蹄铁之争：批林整风
4. 邓邓邓邓邓～～
5.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
（ 1 ）为什么要集中批孔？
（ 2 ）重论中国历史，评法批儒
（ 3 ）造反派的复兴
（ 4 ）周恩来的被动抵抗
6. 四届人大的组阁斗争
7.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8. 批邓、反右倾翻案
9. 四五运动—不要文革要改革
10. 怀仁堂政变，文革结束
DLC: 胜利者与幸存者的新秩序——后文革时代
1. 胜利者的狂欢：揭批查与清理三种人
2. 幸存者的春天：平反冤假错案

(1) 改革开放时期对农村文革大屠杀的复查：
正片：
一. 极简文革叙事：秦晖的四种文革说
1. 支持前十七年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支持文化大革命
2. 支持前十七年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反对文化大革命
3. 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支持文化大革命
4. 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反对文化大革命
总结：
二. 新极简文革叙事：本文作者的七种文革说
1. 左翼反对派：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大的老保！ la 肉好似！
2. 造反派毛左/ 左反（亲毛）：毛主席的本心是造反的，林彪给执行保皇了。
3. 毛左（无前缀）：造比保更保，保比造更造
（ 1 ）与保皇派毛右一定重叠的保守分支：
（ 2 ）与造反派毛左一定重叠的造反分支：
4. 保皇派毛右：崽子们别狂，天下还是我们的天下
5. 改革保守派：团结一致向前看
6. 民运/ 改革自由派：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7. 造反自由派：造反派就是中国的民运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血统论、造反与夺权（1966—1968）

1.白色恐怖五十天

【文革初期有一个词，叫“抛出”。高校党委“抛出”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手握实权的高级领导就“抛出”高校党委书记。这是刘少奇等对抗毛泽东、实现自保的策略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派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性质的运动。为此，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在全国各地组建“工作组”来“指导”文化大革命。

而毛泽东则离开了北京，在五十天内对刘少奇的政策不作任何过问。

于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主的官僚集团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火烧到干部身上，他们在学校里派驻工作组，并把火继续向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如老师）以及黑五类学生身上引导。（也就是让他们做官僚的挡箭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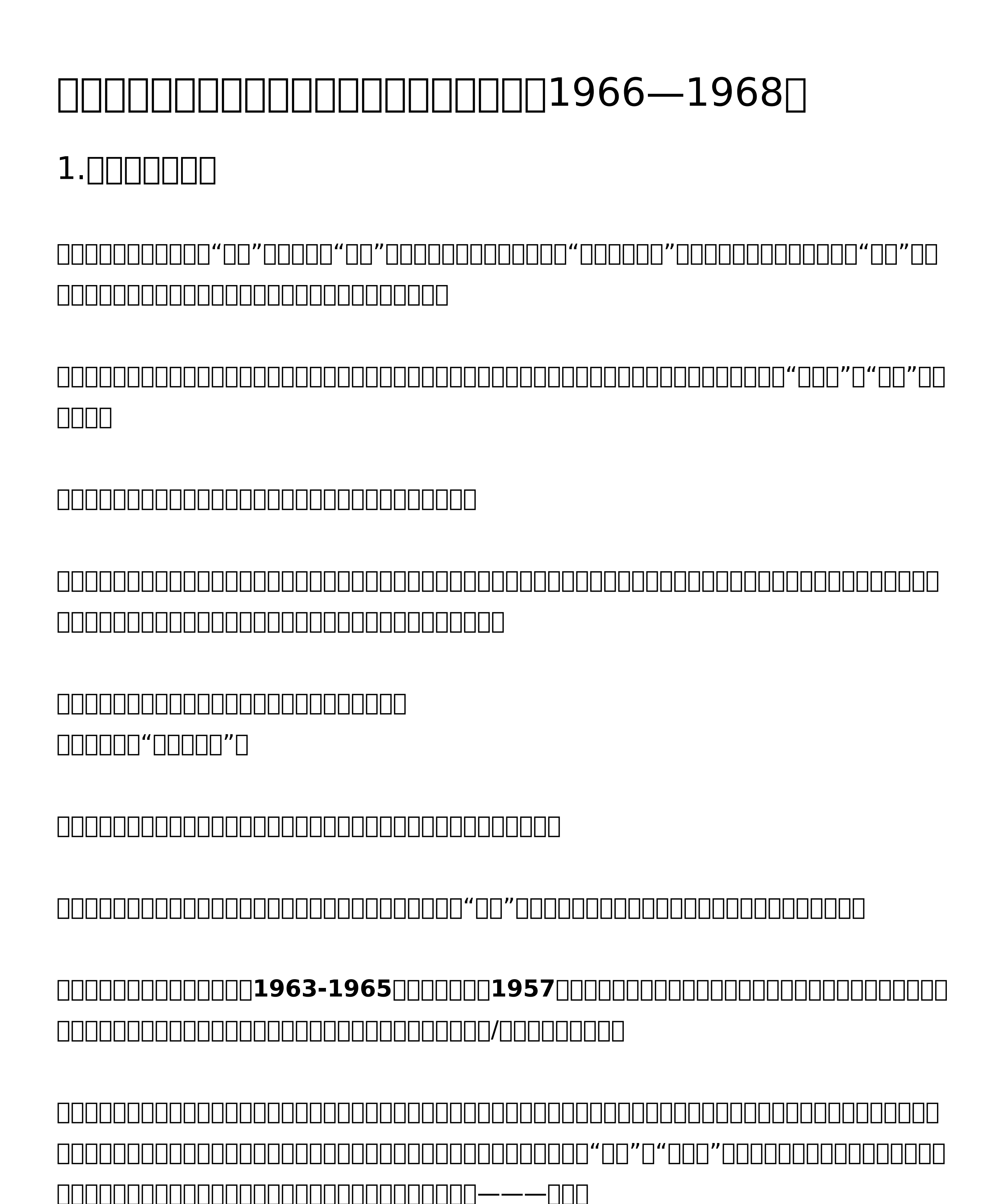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在之后经常被称为：工作组的白色恐怖五十天。
实际上约等于“新反右运动”。

只要有学生贴出大字报，那么就会被工作组定为右派，遭到工作组的批斗和迫害。

在这场风波中，刘少奇旗下的工作组在全国各大学校内血雨腥风的“反右”，造成大量人被批斗、自杀、死亡，干群矛盾继续激化。

工作组的作风延续了四清运动（1963-1965）和反右运动（1957），利用政府的专制权力，以多数人的名义镇压少数对政府不满的异议人士，把他们批倒批臭，并对剩下的人起震慑作用。树立工作组/当权者的绝对权威。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记者关于清华文革运动情况反映的材料，感觉清华文革运动好像是一种白色恐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因为怀疑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做法，就被关押批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逼绝食，被逼自杀。清华的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一个同学卧轨自杀失去了双脚。】———戚本禹



【胡启立：“6月20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邓指示我说：‘那13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13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19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13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6月27日，梁二同等18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北官僚代表人物）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

《》“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

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息⋯⋯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

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像杀一隻小鸡似的平常。

当把高尚年从井裹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邓小平：“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 “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井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全国范围都陷入了工作组的专政恐怖，引发了全国上下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抵抗，学生开始意图造反工作组：

【“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已组织起来闹革命”】

【“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

【“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繫，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

终于在“黑色五十天”结束后，毛泽东从地方回到北京，在听取中央文革的汇报后要求撤回工作组。
他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让中央文革小组为学生老师们平反。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从刘少奇、邓小平这边看，保工作组、对异议人士镇压才是“左派”，造反共产党的都是“右派”知识分子。可在此时毛泽东说法中，因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因此学生造反才是左派，工作组镇压才是右派的白色恐怖。

【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毛泽东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从完全的工作组控制手中解放出来，并为被工作组长期迫害的蒯大富等学生平反。

蒯大富回到学校后写了张大字报：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我见到了毛主席！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衆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毛泽东

【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通过切身经历认同毛泽东作爲反压迫、反迫害、翻身解放事业的魅力领袖，认同“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使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获取了。】—— —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造反派此后把毛泽东当作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人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种极端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周恩来指挥全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邓榕，邓小平的女儿回忆道。

然而，当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将学生从工作组的暴政中拯救出来时，由“老红卫兵”的带起的又一波恐怖时代却正在酝酿着。

2.老红卫兵与血统论

老红卫兵的年纪并不大，同样以中学生为主。
之所以叫老红卫兵，是因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红卫兵，当初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最开始接见的就是他们。而老红卫兵的组成部分是“红色血脉代代传”的红二代们，他们与之后由平民阶层、黑五类组建的造反派并不是一个群体。

在最初，老红卫兵最开始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整的是官僚集团。换句话说，不知道毛泽东要造反的是他们的父亲。
因此他们积极的参与文化大革命，反对工作组。

认为这个国家应该世袭交给他们，他们这些高贵的革命血脉后人是唯一有资格继承国家的。

在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并鼓励红卫兵“造反有理”时，他们以为的造反对象不是官僚，而是社会上的黑五类与“资产阶级老学究”。

因此，他们延续着工作组的作风批斗学校的老师与校长，大搞“血统论”；因为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他们甚至比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组更加暴力、狂妄。

他们认为：班级里的黑五类出身学生，没资格受到和自己一样的教育。并指责老师只通过成绩和课业判断学生是否优秀，完全不看阶级出身。

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
虽然这些人与他们的父亲住在部队大院、洋楼，享受着高级工资待遇，上着北京最好的几个中学。

老红卫兵的“红八月”恐怖时代正式开始！

8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一成立就讲究出身。他们在题为《“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大字报中写道：“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使我们无上光荣。你们说对了，老子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或生长在红色的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就饱受革命的教育。·····我们纯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里受到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就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政权一定要我们掌握！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反对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贴在教室墙上。红卫兵命令10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10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红卫兵命令“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他们，把墨汁泼在他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遭到“斗争”和侮辱，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因而遭到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后来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种种侮辱。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把她从厕所拉出来，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红卫兵突然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杨爱伦，学习成绩优秀还有文艺特长，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推去，强迫她写“交代”，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毒打。等红卫兵回家吃晚饭时，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不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

9

【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让她跪在一张方桌上，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旁边由人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已怀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1966年8月5日午后。北京师大学女附中（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同时被毒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老红卫兵以后，暴力升级。

《》

【北京官方史料，从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 118.8万余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达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

在此期间，高干子弟正式成立了大名鼎鼎的“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组织成立后，在北京城内大肆打砸抢烧。西纠的成员包括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孔原之子孔丹，董必武之子董良翮等。

著名人物老舍，以及一众留在北京城内的文艺界知识分子，也是死在这些年纪不过才十几岁的人手中。

【8月23日下午3点半，一队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他们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干部赶到大院，在强烈的阳光下罚站，每个人脖子上挂上一个写有“黑帮”的大牌子，男女红卫兵手举铜头皮带往他们背上抽打，其中有著名作家、全国文联副主席老舍，
他被打得鲜血直流，两腿摇颤，眼镜被打在地下。打过之后，

红卫兵押着这些“牛鬼蛇神”到国子监孔庙，命令他们把仓库里的京戏服装、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这些人围成一圈跪下，点火烧毁这些戏装和道具。有的红卫兵还拿起木刀向老作家头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满脸是血。

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而被加挂“现行反革命”牌子，遭到残酷殴打。8月24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曹滨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亲樊希曼被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曹滨海从此精神失常。】

周恩来对此事件评价道：“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同一天，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红八月时代还将“破四旧”运动带入最高潮，大量文物在此期间被老红卫兵损毁，同时大量地名、商店、街道、学校被改名。北京城内的的红绿灯从“红灯停，绿灯行”，转为“绿灯停，红灯行”。

直到一年后，破四旧才被慢慢叫停，而除了老红卫兵外，其实全国各地也有部分造反派参与对古迹的破坏。

3.炮打司令部——造反派的崛起

造反派从文革最初就已经产生（如首都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井冈山兵团等），并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迅速崛起。
造反派的特点在于对官僚特权的批判，而这些反对官僚体制的人多为没有特权的小老百姓、知识分子或者黑五类群体。

在文革刚开始时，各级党委首先利用工作组将火引导到知识分子，随后又与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合作镇压群众与黑五类。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严厉批判了工作组，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入土。

但是地方各级党政官僚仍然能通过提前组织、操纵地方文化革命小组的方式，事实上延续工作组对造反派的镇压方针。

他们高喊保皇派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将反对地方官僚与地方文革小组的造反学生说成右派，这也就是日后造反派所称的“九月反扑”：
【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

为了阻止各地官僚们对造反派的镇压，毛泽东宣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是各级党委为了抵制造反、阻止文革进一步发展，对造反群众实行镇压。”

在之前，毛泽东平反了被刘少奇工作组迫害的蒯大富等造反派，而现在彻底为造反派群体平反，并宣布“打倒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答：老红卫兵与高干子弟的爹妈

于是，在毛泽东亲自对领导干部进行批判后，形势逆转，红二代们瞬间失势。短短几个月后，老红卫兵和“西纠”组织从被党中央特殊保护的、高高在上的革命小将变成了反动派。

12月27日，周恩来说：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
随后，西纠的创始人之一孔丹被捕。

西纠的创始人在材料送给周恩来，还附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了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 为此，周恩来在结束讲话后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了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

就这样，老红卫兵逐渐退场，造反派运动开始崛起。造反派打着毛泽东的口号，开始冲击他们眼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腐败的当权官僚们。

因此，老红卫兵群体必然与造反派势不两立。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老红卫兵）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造反派）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救，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子为什麽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遛走】——《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对于这些红二代来说，他们无法忍受自己从“革命好汉”变成了“混蛋”，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动”。他们不能容忍，一个月前他们羞辱的“黑五类”，正以造反派—— 《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于是以“西纠”为首的老红卫兵正式从反对刘少奇工作组，变成了反对以江青、王力、关峰等人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保皇派红卫兵”，成立了大名鼎鼎的“联动”组织。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联动”宣言：
【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国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来发表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
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体干部子弟！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会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北京的“联动”组织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喊出“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刘少奇万岁”的口号。一些联动成员威胁要把戚本禹（中央文革成员之一）开汽车撞死，说：“戚本禹不过是十七级干部，算老几？”

1967年1月，毛泽东把联动定为反动组织：“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

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

由此，老红卫兵正式退场！

彩蛋：聂卫平同志的事后回忆

文革期间，习近平、聂卫平、刘卫平三人被称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在一次红卫兵武斗中，他们三人遭到了突然袭击，聂卫平回忆：“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荡。”本文摘自《聂卫平·围棋人生》，作者聂卫平、王端阳，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父亲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我们在班上是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平”了他们。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荡。我们没能“平”了人家，结果被人家打惨了。前不久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4.工人造反派夺权狂潮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

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告全省人民书

在 66 年下半年开始到 67 年一月，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逐渐由学生运动转为工人运动，最终，以一月风暴为先声，工人造反派推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党委，成功施行夺权运动。

简单粗俗的来讲，在最开始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曾经号召工人在造反以及剥夺各级党委官僚的权力后，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也就是工人直接民主，由工人直接选举与罢免政府，在工厂和企业里实行产业民主。

1967 年一月，在中央文革的代表张春桥的秘密参与与策划下，上海工人造反派成功夺权上海党政机关，并由王洪文在讲台上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震惊全国。

此时也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最左最激进的时期。在国际上，红色中国这一举措也让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分子十分激动，他们曾以为中国找到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光明正路，一条明显区别于苏联官僚极权主义的新道路。
这也是为什么，在 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中，能看到法国左派学生高举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托洛茨基等人的画像。

然而，这里个人插句嘴。造反派之所以能成功，最大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默许以及中央文革派在背后的支持。

也因此，造反派事实上陷入了一种悖论——中央文革同样是新官僚
由于巴黎公社原则最终并未落实，在许多自由派看来，造反派事实上成了新官僚打击旧官僚体制的工具，如果他们与中央文革继续合作夺权成功，那么极有可能跟着退化成新官僚。
而如果造反派不再听从中央文革（如极左派），那他们将会同时受到中央文革与官僚集团的镇压。

5.二月逆流——大闹京西宾馆、怀仁堂

中央文革小组的崛起和造反派在地方的夺权，引起了军方与官僚的高度警惕。再加上不久之前，这些中央人物他们的儿子女儿刚刚因为参与“联动”红卫兵组织，而被视为“保皇派”反革命，蹲着大牢。
而现在，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风潮到了军队里，过去的老元帅和军队高层一同正式的站在反对文革，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立场上。

【叶剑英：“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陈伯达辩解：“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论述。” 叶剑英：“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我们搞了一辈子的军队，就这样被他们毁掉吗？”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
康生反驳徐向前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聂荣臻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 …

张春桥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吧，看群众答应不答应。”
谭震林：“党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现在党不管用了。”
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
蒯大富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

这个文革是党史上最残酷的整革命干部的运动，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

所谓的“百丑图”（群丑图）如上，作者翁如兰事后《》 中央领导人。

说回正题

二月逆流非但没有完全毛泽东回心转意。相反，老干部与元帅们的抵制让毛泽东非常震怒：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

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

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于是，元帅们与老干部们全都“失业下岗”。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元老们遭受批判，作出检讨。

因此，被视为忠诚于毛泽东本人的林彪系统在军队内更加独大。

然而与此同时，毛却批示上海人民公社：还是叫上海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与公社，看似只是名字不同，实际上则完全不同。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称：领导最终要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三结合”（干部、军队以及群众代表）只是过渡性质《》多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与夺权的黑龙江省形成了鲜明对比。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北京。毛泽东与他们多次谈话，否定了之前自己建议的“公社”名称，表示公社选举制度将破坏党的领导。

张春桥、姚文元遂于2月18日返回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指示。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正式否定“人民公社”名称，并以“三结合”作为评判各地权力机构的标准。
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毛泽东突然放弃了公社直接民主制度？对此不同派系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

来自左翼学者方面有两种主流看法：

1.在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搞公社直接民主从一开始就是空想、不切实际的，建立社会主义必须保持先锋队一党专政，因此将公社变成非选举的、协商性质的革委会更有利于革命；再说了，十六条里虽然规定了“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后一句也明确提到了：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2.毛泽东虽然想搞公社直接民主，但是意识到党内高级干部和军队的强烈抵抗，有可能会造成政变甚至内战，使得国家万劫不复。因此可以采取革委会制度，并突出解放军的作用来安抚保守派。此外，在天津的夺权后曾经实行过一次群众选举，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保守派居然得了多数票，这说明在文革早期条件下革命并不深得人心，必须要实行一段时间的革委会专政。

来自自由派以及右翼学者方面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9

1.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搞什么公社民主，毛泽东只是想用文革来打倒整个不听他话的官僚集团，实现他个人的极权。因此毛泽东只是用“十六条”来欺骗人民造反，而并不真心支持巴黎公社原则。

— —

但无论时哪一种解释，都不可否认毛主席最终在行为上否认了巴黎公社原则，并略微转向保守，转而支持将革命委员会，这种由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以及群众组成的协商体制长期的保持下来。

6.军队摇摆不定，陈再道勇救落水老人

在此之后一直到1968年，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保皇派（现称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

在当时，造反派仍然以社会中下层为主，在他们的背后有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作为靠山。造反派的斗争对象仍然是各地的官僚与党政机关。

而保守派在联动失势后，则不再单纯由高干子弟支持，而是由各级官员，以及拥护地方党政官僚的群众组成。而在此期间，许多军方势力也在背地里支持着保守派。

在1967年，此时的军队上层基本由林彪集团把持，因此在军队名义上支持毛泽东与文革的前提下。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文革，并要求他们支持造反派，恢复秩序。
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政策因此出台。

毛泽东给出的方案，是要求军队帮助革命左派（造反派）夺权，给造反派发武器。

可结果是，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左派，但军队往往会宣布当地保守派为真正的造反派，给他们不喜欢的造反派编织罪名，然后光明正大的支持保守派，因此支左政策往往成了“支保”政策。

内蒙古文革历史在这一点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67年1月，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后，内蒙古军区开始“支保”，介入武斗并支持内蒙古保守派。 2月5日，内蒙古造反派“呼三司”、“河西公司818”等在军区大门前静坐抗议军队“支左”镇压造反派，一名20多岁的学生韩桐冲在最前面喊口号。
随后，时任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走出大门，他威胁那名学生：“再喊就毙了你”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名学生热血地喊道。

军官柳青被这句话激怒，直接掏出手枪对着那名学生连开了两枪。随后这名学生在三小时后不治身亡，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二·五韩桐事件”。

之所以说它划时代，因为这是军队对造反派开的第一枪。韩桐是“三支两军”后死在军队手里的第一位造反派牺牲者，恐怕也不是最后一位。

以下为1967年1月到7月，军队—造反派冲突时间表：

1967年1月:
上海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建立
1967年1月28日:
军委八条下达;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文革，支持造反派。
1967年2月:
二月逆流事件，元帅将军联合反对文革；二·五事件，军队力量和造反派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各省军区开始事实上镇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 1967年3月:
各省造反派游行反对二月逆流，要求释放被军队镇压的造反派。
1967年4月6日:
军委十条下达，毛泽东第三次平反造反派，反镇压。

… …

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毛泽东都在小心翼翼的平衡与协调造反派与军方的关系，因为谁都知道军队一定是代表保守力量的。

然而这种和稀泥无法持续下去，两个鸡蛋上跳舞一定会踩碎一个…

于是，我们的陈再道同志在众星捧月之下出场了，成了那颗被踩碎的鸡蛋。

… …

“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

武汉事变：指在1967年七月，毛泽东前往武汉试图调停保守派（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工总、二司等）的矛盾时，差点遭遇武汉军区首脑陈再道和旗下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堵截。

前因：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是保守派组织。消息迅速传开，造反派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已经亲自到武汉。

这是因为百万雄师虽然是保守派组织，但内部存在着相当的维护机关干部的工人群众，并不比造反派工人支持者少，这一点可能与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不同。

同样与很多人刻板印象不同的是，以刘少奇、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温和派官僚在前三十年真正崇尚的是苏联体制，而非是一些人想象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机械的”。即笃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消灭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论。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强调“剥削有功”只是因为他认为中国那时候的任务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也因此他当时不急切强调农业的集体化，他认为应该“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
但在三大改造后，刘少奇又紧跟中央，同时他又是“人民公社”概念最早的命名者。

刘少奇本人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强调工农剪刀差，更是强调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保卫苏式的八级工资制和干部特权）；同时刘主张以苏联为榜样，外交上希望对苏和解。

而在大跃进后，毛泽东对经典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实际上逐渐走向批评态度，认为这套体制不利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公平。例如，毛泽东曾批评卫生部门对城市工人阶级过度倾斜：“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因此不难理解，实际上武汉地区在过去工业化水平较高，工人并不是过去十七年“经典苏式指令经济”的体制下的受害者。相反，工人阶级在这套国家包办一切社会福利的模式下实际上物质条件很不错，造反派要砸烂特权反而有可能触及到他们。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扬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武汉的两派都是工人阶级的，都是相信自己在维护社会主义的，并没有经济基础上的根本矛盾，他相信双方是可以被他本人调解的。
然而，这却成了文革以后毛泽东战略上的重大误判。

7月16日，武汉街头出现了百万雄师（保守派）的大标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军方支持百万雄师（保守派）炮打王力，表面上看他们的言论切割的王力和中央。实际上他们知道是中央的意思，只是用这种方式对中央文革实行软抵抗。

18日晚，王力发表讲话：（陈再道的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武汉军方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几天后，百万雄师（保守派）甚至包围了中央文革与毛泽东居住的宾馆。

【数十名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武汉军区大院，要谢富治接见并回答问题。他们质问军区领导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集结在武汉重型机器厂一带的“百万雄师”的群众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车同“武汉公安”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包围了谢富治和王力。

谢富治走出来质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20日，由独立师的某副营长带队，端着冲锋枪的独立师军人，枪口直接对着谢富治、王力。
在有的战士对王力进行“抄家”前，他们先碰到陈再道。
结果战士用枪托殴打陈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

甚至在一些人的回忆中，当时个别武汉军区的成员在知道毛泽东在这里后，还密谋要将毛泽东抓起来扣留。

【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怎么样了？”
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那个老头。” 张根成知道“那个游泳的老头”就是指毛泽东，心里顿时咯登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被抓走的王力听到打他的人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
王力怀疑他们说的“老头子”就是毛泽东。】——结合张根城与陈再道的回忆。

这也是当下著名网梗“陈再道将军勇救落水老人”的出处。

最后，周恩来和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迅速作出反应，派飞机把毛泽东从武汉救回来。
这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后唯一一次坐飞机而不是火车专列在国内通行（不算对外访苏）。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选择各打五十大板，撤销了陈再道的职务，任命林彪“活党”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林彪“死党”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然而，在批评陈再道的同时，毛泽东却把百万雄师要惩办的王力送进监狱，以此来对武汉激进的武斗灭火。王力在之后边一直蹲监狱，一直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没出狱。

在武汉事变后，中央文革小组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王力、关峰、戚本禹”都被隔离审查。毛泽东给出的理由是：这三人试图利用造反派夺权周恩来。

陈再道则于1972年后复出工作。

对此不同派别与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有着不同解释。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毛泽东逐渐认识到长期无政府状态可能会造成国家瓦解与军阀混战，因此必须与军方做一定的妥协。

也有人认为毛是担心继续激进的冲击旧官僚体系，可能会造成更多类似“陈再道”兵变的“下克上”事件。因此毛不得不牺牲掉中央文革的亲信来防红曾
和中央文革小组会“全面内战”。

但无论如何，武汉事变被视为毛泽东的造反气息逐渐退却的文革众多关键时间节点之一。

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开始限制各省造反派的串联。
10月，毛泽东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各省串联被实际禁止。

7.革委会的建立与造反派的失势

【 “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委会，是1968年的主调。已经复职的官僚们和支保部队的军事官僚，借恢复秩序的机会全力镇压造反派。】

毛泽东原本期望的是“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也就是希望夺权顺利且迅速，并最终过渡到没有走资派的新秩序：“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而随着时间推移，无休止的武斗与无政府状态让毛泽东开始失去耐心。
此时的中国除了会因为武斗荒废日常行政与生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要同时面临美苏两大帝国主义的对外威胁，无政府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在武汉事变后，毛泽东前往上海。
在上海，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分裂，而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选择直接用武力镇压不服从的另一派在野的造反组织“上柴联司”，一统上海造反派江山。
王洪文处理问题之果断、干练、年轻，同时又是造反派，令毛主席对他留下深刻的好印象。

此外，武汉与上海的两次接连发生的武斗事件和截然相反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战略思路——旧政府垮台后，工人造反派必须结束武斗，而且应该允许上海工人造反派组建民兵。

1967年中，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文革战略全面收缩的一段时间

10月7《》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提人不是好办法；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党内走资派只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事实上，从武汉事变开始，由于各地方军区掌握枪杆子且“割据”一方强力“支保”，再加上毛泽东文革战略逐渐转变。造反派势力开始逐渐退潮，

到了1967年底，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命令下达后，军方往往以“反对武斗”的名义介入干预造反事务，实际上镇压造反运动。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这一条，将群众组织头目们（无论保造）抓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关禁闭。

因此，即便是在军队帮助下成功夺权的省份，造反派内部也开始分化出新的“激进派”和“拥军派”（如云南的八派、炮派，江苏的红总派和八二七派）；激进派表现出了对军队乃至中央政策的抵触与阳奉阴违，拥军派则取代了保皇派，成了军队在夺权时期的镇压工具。

在广西，广西解放军支左部队在“支左”的过程中，将军火全部交给了事实上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而“联指”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就背靠广西军方势力对造反派实施大屠杀。而正如前文我反复提及的，黑五类和右派分子往往会在政治运动倾向造反派。因此许多“联指”成员和农村党政干部开始在农村实行对黑五类的大屠杀和满门抄斩。

广西造反派“4·22”为了迎战用支左部队的枪支武装起来的“广西联指”，开始抢军火库，甚至拦截援助越南的武器，并不断寻求中央的解救。

可惜的是，毛与中央此时已经不完全站在造反派这一边了。

因为到了1968年时，文革已经彻底到了失控的边缘，与1966年初期和1967年那种明显能看得出“保、造”二元划分的时期比起来：从地方到中央，从人民到官僚，当局者几乎已经难以理清各自的立场划分。

武斗的扩大化与造反派内部不同政见的分裂，再加上当时中央文革已经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刘少奇的中央政府体系，成了新的中央政府与各级官僚合法性的直接来源，“造反”已经成了这个国家表面上的政治正确，所有的派系都会打着造反和支持文革的旗号。

1968年7月，中央发布了事实上有利于军区的7·3布告：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一布告可以说代表了毛泽东没有点破的对“结束文革、恢复秩序”的期望。无论是恢复了职务的官员和支左部队，还是支持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周恩来），都转向镇压造反派，恢复秩序。

在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已经分裂成了“团派”和“414派”。
团派：井冈山兵团总部，由蒯大富作为代表。
414派：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我们这代人熟悉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就曾隶属于该派。

两派从1968年4月开始就在清华校园搞造反派内部武斗分裂，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直到百日后，几万名解放军和工人毫无预兆的冲进清华大学，把两派造反派全都“同归于尽”了，并强制接管了学校权力。

清华造反派立刻实行抵抗，认为这是镇压造反派。蒯大富还宣称要揪出这些人背后的黑手！

… …

【蒯大富走进来，脸上挂着泪珠。江青看着蒯大富那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主席的手，一下子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号陶大哭，一边哭，一边告状：

“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操纵10万工人，严严实实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他们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同学们又去跟他们讲理，鲍长康、潘剑虹都被抓走了。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 … …

原来，是毛泽东要求“工宣队”进入各大高校，强制接管学校的全部权力，结束武斗、控制文革。

各省和各大高校都开始转入由工宣队、军宣队对造反派的镇压。

1968年7 月24 日，中央颁布7·24布告：“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7·3布告”，不得违抗。”

全国各地造反派代表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齐聚北京，商讨对策，结果被毛泽东、林彪集团、中央文革和周恩来定为“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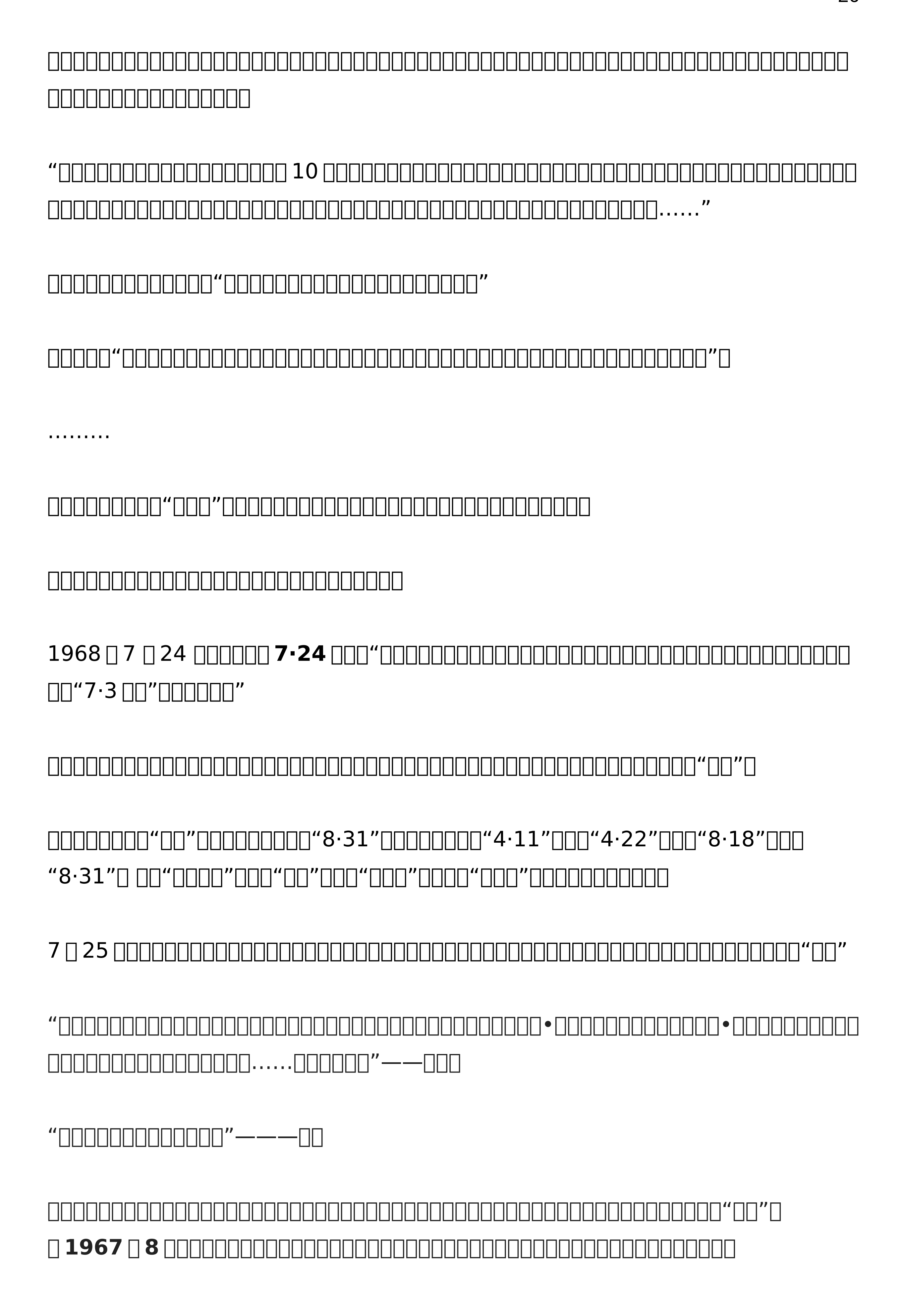
【参会者包括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8·31”头头武传斌、贵州“4·11”、广西“4·22”、青海“8·18”、辽宁 “8·31”、河南“二七公社”、广东“红旗”、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

7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严厉训斥造反派，指责各省造反派头目在一起开“黑会”

“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毛泽东

“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林彪

在许多反中共人士（非本文作者）看来：真正让中央警惕造反派的并非是因为清华造反派的无限制武斗，而是造反派们的“串联”。在1967年8月，造反派的活动被中央下令限制在本省本市，例如广西人禁止在广东造反，湖北人禁止在湖南造反。



因为一旦允许造反派们继续跨省造反、串联，那全国造反派可能会结成一个类似后来波兰“团结工会”不受控制的全国性工人、学生反对派，并严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警告不听话的造反派：

“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该对话发生在蒯大富入场前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4·22”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4·22”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4·22”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4·22”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秦晖的回忆，时为广西造反派“4·22”成员。

【《·》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保皇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 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晏乐斌

【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

广西秩序井然……

28

在广西军区用枪杆子建立所谓“革命委员会”后，便把枪口对准了422与同情422的民众和干部，第二波大屠杀开始。在整个文革结束后，根据统计广西大屠杀总共有十几万人被残忍杀害，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
大部分被害者死于1968年革委会建立之后。

1968年9月5日，继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同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

全国秩序井然…..

造反到此结束，毛泽东事实上默许甚至领导了对造反派的镇压。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在1968这“关键转折年”后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中国人的自由结社与四大自由事实上重新被遏制。

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第四条规定:“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传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整个文革，真正造反时间不到三年。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西方毛派往往认为“文革只有三年”

那么人们就好奇了，不是十年文革吗？怎么造反派才68年/69年就失势了？革委会不是组建起来了吗？

现在我要讲述的，才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血腥，最复杂，最被人误解的一段时期——全面镇压的军事极权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军事极权（1968–1971）

江青：“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做‘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伯达呀这批‘官僚’。”——毛泽东

在最初，革委会以及其前身（如上海公社）曾宣布要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可历史却戏剧性的走向反面。

在三支两军政策后，为了维稳，各地的军事要员几乎都成为了新设立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而各地革命委员会，慢慢的都变成了事实上的军政府。

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9年底，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万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全国实行军管的省有9个，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25个，几十个专区和数以百计的县实行全面军管。那些没有实行全面军管的省、市、县，也都实行了部分军管。

县级以上的革委会军人担任主任的达80％以上，其中，云南和湖北达97％。

一些中央部委实行军管，如，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实行了军管。

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大多数人对造反派是不满的。

【在文革中除了从外地新调入驻地的21军（军长胡炜，1967年2月把21军从山西调进陕西）、38军（1967年2月从吉林调河北），12军（军长德生，1967年8月从江苏调安徽），等部队以外，几乎都是反对造反派的。特别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和驻地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镇压造反派的更为普遍。】

文革初期造反的极左重新被镇压的极“左”取代。
而许多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印象里的那个“充斥着极权主义，大肆屠杀异议分子的”文化大革命黑暗年代，实际上主要来自于这一时期。

在往常，中国政府会说施行屠杀的，是林彪、江青集团为首的造反派，而被屠杀对象是知识分子和黑五类。

一些刚刚接触毛左派理论的网友，认为中国政府和海外反华分子说的不可信，于是他们直接把历史颠倒了过来，认为既然林彪和江青是造反派，那么被屠杀的就应该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真正的情况是：施行屠杀的是林彪集团，被屠杀的其实是造反派（以及逍遥派、一般知识分子和群众）。

此外，与刻板印象不同，人们往往以为在文革结束后抱怨“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的“老保”。实际情况是，许多学生造反派恰恰是上山下乡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各地军政首脑为了驯服学生这一激进造反群体，稳定生产秩序，往往会采取“鼓励”造反派学生下乡的方式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地盘。实际上相当于让学生红卫兵退出了政治。

当然，也有建制温和派（如温铁军）认为：上山下乡是非政治性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过剩的劳动人口。

此外，在知乎上流传着一张名单，里面细数着 1968 年被屠杀的知识分子。

> **如何看待伤痕文学对于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
> [redacted]
>
> 资料来源，网络:
>
> 赵九章、姚桐斌、汤飞凡、萧光琰、邓叔群、董铁宝、周寿宪、虞光裕、董坚毅、傅作恭、陈绍澧、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陈焕镛、周仁、熊庆来、徐舜寿、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叶企孙、马特、周华章、林鸿荪、程世祜、陈天池、徐瑞云、王琎、胡思杜、陈寅恪、陈垣、曾昭抡、翁文灏、钱晋、翁心源、陈梦家、丰子恺、谢家荣、李璞、司幼东、詹安泰、王荣、吴宓、束星北、余柏年、雷宏叔、伍钦荣、许宝禄、程述铭、姚启钧、马幼源、李其琛、毛青献、毛启爽、王茂荣、吴鸿俭、殷大敏、余启运、胡先啸、吴定良、傅连障.

很多评论于是说：造反派太可恶了。

这个时候就会有毛左派纠正：这些知识分子是同情造反派的，屠杀他们的是保守派。

两个说法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因为屠杀他们的是革委会的军宣队与工宣队。

你说他们是保派？他们是革委会的权力代言人，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走资派的口号挂在嘴边不停歇。

你说他们是造反派？可他们干的最多的，就是屠杀造反派。

很多人一提起“保”，就会想到刘少奇、邓小平。但实际上在当时，刘少奇与邓小平早就倒台了。

在一些造反派中的异端派（如省无联、北决扬、“李一哲”）等在当时认为：中央文革与林彪集团，已经成了新的保皇派。

军宣队、工宣队的镇压和刘少奇的工作组没有区别。

他们要求像造刘少奇工作组的反一样，去造军方主导的“革命委员会”的反，而他们要面对的却是牢狱生涯与血腥镇压。因为这次他们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了。

【就造反派和军政官僚集团的关系而言，各地大体有如下的经历：群众造官僚集团的反，官僚集团（工作组）镇压造反者（1966 年 6 月初到 7 月底）

毛泽东第一次为被镇压的群众平反，官僚集团软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团（地方文革小组）之间博弈（1966 年 7 月底到 10 月初）

毛泽东第二次为被镇压的群众平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取得主动权，各地官僚政权瘫痪（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

夺权、军队支“保”，造反派分裂为不同的山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混乱（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后两年）

军方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镇压造反派，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

毛对“二月逆流”的反击，下发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毛泽东第三次为造反派平反（1967年 4月中旬开始，以后各地时间段不同）

经过一年的调和，军造关系全面破裂，毛泽东逐渐选择保军队，放弃造反派。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实际上重建了工作组模式；7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五大学生领袖”，和造反派诀别。

毛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军方在组织“大联合”中支持保皇派和拥军派，镇压激进造反派。 1968年9月5日，各地军方起主导作用的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军政府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随后军政官僚控制的革委会“复旧”，造反派“反复旧”；1968到1972年，军队持续镇压反对革委会的造反派，巩固革委会。】— — — 杨继绳观点

据说，毛泽东在最后一次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时，也曾经留下泪水。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韩爱晶记下这么一个细节：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他一方面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革命司令部。

另一方面又是他要摧毁的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种悖论造成毛对待造反派经常显现出矛盾复杂的心态。

1.反复旧的失败，革命的结束。

许多当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秦晖、杨小凯、宋永毅、杨继绳、温家宝）其实不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参与了造反派，因为他们不是红二代，不是高干子弟。他们反对血统论，反对官僚追求民主，所以才会参加造反派。

也因此在他们的叙述中，造反派经常是白莲花的存在。

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文革时期死人最多的不是武斗，而是死于1968年后，林彪军事集团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大规模虐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彪军政时代的革委会比刘少奇的旧文官系统强不了多少，甚至更差。在革委会建立后，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落实，革委会甚至开始出现了“复旧”（也就是变回原本的官僚体制）。

以武汉为例：

【7月25日，省、市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七·二四布告》。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林彪活党）和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林彪死党）召集所有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由省、市革委会举行的会议。

会议指责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同时解散造反派组织，奉劝造反派组织交出抢去的一切武器，解散一切突击队。8月中旬，省革委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头头们普遍受到批判，被关禁闭。】

【8月27日，曾思玉和刘丰派工宣队进驻所有单位，领导“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和军宣队成员按北京提出的标准选出，第一个条件就是阶级背景好，因此他们很可能是保守派或保守派同情者。】

【到1969年上半年，全省在校知识青年全部上山下乡，武汉学生造反派全被赶出了城市政治，接受“劳改”。】

【最初是将被认为阶级成分不纯的造反派撤职。然后又借口巩固和调整革委会，大批撤换许多单位的革委会成员。有些单位的革委会完全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斗批改领导小组”或“革命领导小组”取代。至1969年初，造反派丧失了在武汉各级革委会中的多数权力，工代《 》 ———

【到9月，武汉736个造反派组织撤销了638个；被夺权的180个单位革委会，交回权力的有125个。】

眼看着革委会马上要变回那个官僚专政的机器（俗称“复旧”），很多仍未褪去革命热情的造反派于是决定掀起“反复旧运动”，然而这一次中央却一盆冷水浇下来。

周恩来：“‘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

康生说：“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说：“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反复旧’的口号，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2.清查五一六

1967年7月1日，北京外语学院成立了名为“五·一六”的极左造反派组织，将周恩来称为“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并称他为“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

1967年9月8《》《》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结：在1967年曾经出现过一个极左造反派组织“五一六”，认为周恩来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这一组织很快遭到取缔，并随之解散不复存在。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整十年都在清查所谓的“五一六分子”。这是因为在68年后，一切反对革委会与九大后新成立的党中央的人，都会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清查五一六运动相当于为造反派建了一道墙，一旦造反过了头，那么“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就会扣在你的头上。

目前在互联网上与此相关比较出名的meme，有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将军。在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借此机会打压造反派，将主政的江苏省革委会45名常委中25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短短3年多的清查过程中，江苏全省25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过2000人死亡。

清查五一六运动，名义上是要挖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然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总后台。

因此全国范围内对五一六分子的清查，实际上纯粹只是打压不愿服从各地革委会的造反派的一个借口。许多地方都以是否拥护革委会的军方领导作为判断造反派是不是五一六分子的标准。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早期人物“王力、关峰、戚本禹”被毛隔离审查后，一段时间内把这几个中央文革早期的极左人物视为五一六分子的总后台（表面上逻辑通顺，都反对周恩来）
然而在这些人倒台后，五一六分子的清查还没结束，在之后1970年的庐山会议，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因为炮打张春桥结果自己倒台后。又说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是整起事件的黑后台，这样的解释仍没有说服力。

因为在林彪叛逃以前，批评林彪和反对革委会是“五一六分子”的所谓“典型特征，然而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又说林彪才是“五一六分子”的总后台。
在这场超过十年的清查运动中，共造成了十万人非正常死亡。

3.极左派、异端造反派知识分子的短暂抵抗

激进造反派，指的是在在三支两军、革委会成立前后，继续反对已经蜕变为军政府的革委会的造反派分支，他们通常亲近党内的中央文革派。

而所谓异端造反派这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公开的对中央文革、林彪的中央军委甚至对毛泽东本人的政策与保守化提出质疑。

在异端造反派内，还可以分出极左造反派，他们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的工人民主专政。

除了极左派以外，还存在温和异端造反派。他们希望用非暴力手段，确立社会主义法制（治）、宪政作为“共同底线”，反对行政运动式治国、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

（1）“北决扬”案：极左派造反派

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北斗星学会 ”，并在汉口水塔民主墙上张贴了《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
鲁礼安等人12月下旬又组织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出版了《扬子江评论》。社会上称他们为 “决派”，当局后来把他们简称为“北决扬”。

他们观点激进，公开批革命委员会、批军区、主张武装斗争、批周恩来、批张春桥，甚至不点名批判毛泽东对军方的妥协。
要求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实现工人民主。

原文部分择选（完整版可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 516 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扬子江评论）（ 1968.5.16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扬子江评论， 1968.6.20 ）

【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迹。】

… …

【有人说（张春桥）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 “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 …

【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这句话事实上在隐约影射毛泽东对军方的妥协

… …

36

对此，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必须坚决取缔。《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

1968年5月17日，鲁礼安到黄石市为印刷《扬子江评论》找纸张，在铁山被新派抓获，长达11年的关押没有审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诉。
冯天艾也在监狱里关押十年。湖北的清查运动长达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分子”、“北决扬”被审查的共 33659人。

（2）省无联案：极左派造反派

杨曦光（杨小凯）是当时另一个极左造反派组织“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他曾写下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表示革委会正在堕落为新官僚阶层，必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工人民主。

原文部分择选（完整版可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中国向何处去（杨曦光， 1968.1 ） (marxists.org)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 …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 …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 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 ….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 …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 …

然而，文章出现后被康生、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点名为“反革命”，康生认为这篇文章“实质是极右的” “是反革命的”，并认为这篇文章理论水平远超出一个高中生乃至大学生的能力，必定有幕后黑手。
杨小凯和省无联成员随后被捕入狱。

（3）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事件：

【述森、鲁志立、陈通明、张维智、张绍臣等13位年轻人在1966年、1967年曾经满怀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感到迷茫，从运动中退出来埋头读书。他们是中学生，1968年都成了插队知识青年。

每到夜深人静，青年们就聚集在小茅屋里读马列著作。成立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在两年时间内，他们带着文革中的现实问题，阅读了《马恩》《》《》 20多篇读书心得。

他什中“禁止一切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压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地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经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他们喊道：“打倒法西斯！”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他们说，林彪像当年袁世凯一样利用文革篡权。他们在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旁边批“放屁”二字。“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13人中，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在囚禁中自杀身亡。】

（4）“李一哲”案：温和造反派

在林彪专政时代，异端造反派几乎都遭到迅速打击而瓦解，可很快到了1971年。林彪与毛泽东却戏剧性的走向对立：林彪成了反革命，叛逃祖国最后摔死在了蒙古。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先前林彪集团造成的冤案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新审查。党内也在之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在这一背景下，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和工厂工人“《李一哲”为名义发表了一篇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这篇大字报与过去同样反对林彪集团的极左造反派截然不同的是，它并不要求继续夺权，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呼吁起了法制（治）与民主，反对人治、反对个人崇拜和运动式治国。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批判“林彪集团”，将一切暴力揪斗、批斗他人，刑讯逼供，滥用职权，对官员和人民群众上纲上线等当今人们经典印象里的 “文革”描述成“林彪系统”的错。

实际上是在炮轰整个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式。

《》

原文摘录：

【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 “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 …

【我们没有忘记那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其繁的“忠”教礼仪--“早请示、晚汇报”，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上街、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罩上了浓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 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假、丑、恶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 …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３.１８”、“４.１２”、“５.３０”、“６.２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有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 …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了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威胁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５.１６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什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借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 …

【几百年几千年出现的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按“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 …

【“什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的一段话。】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串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非把他们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

… …

【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

… …

【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成了“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他实际上不是已经实行了）了吗？】

… …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的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 …

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4.一打三反：林彪、中央文革镇压案例：

石仁祥：
【他写了《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列举了林彪的28条罪状，信中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在信的末尾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革命战士石仁祥。
在毛的生日1968年12月26日，他将这封信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他原来所在的部队。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出2名军官到安徽，向省革委会和人保组传达吴法宪对石仁祥信的口头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

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他在狱中在墙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
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审处决时他的喉管已被割断，乡亲们听不到他最后的声音。】

… …

在1970年，中国在林彪如日中天的时代开启了一打三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和一般异议人士进行进一步血腥镇压。

与1966年“红八月”的不同，是红八月由出身决定人的命运，而一打三反则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处死。而这个“反动的思想”甚至包括马列主义，因为只要你说了反对林彪、江青甚至毛本人的话，都会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

而这场运动到了地方和农村更是层层加码，你可能只是跳革命歌舞不认真，或是在农村的“早请示，晚汇报”不认真，就有可能被抓起来甚至枪毙。

注：“早请示，晚汇报”是林彪军事专政时代的一个现象，内容包括每天早晨对着毛泽东的照片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对“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数，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丁抒先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枪毙，发现被经过法律程序死人最多的按百分比来计算，是在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间。一个初略的估计，在全国就有十万以上的人数。按照中国古代的刑律，一定要“杀人偿命”，至少你要杀人越货或者放火、抢劫，你得有个罪行呀，但在“一打三反”中却不需要了。河南有个学生讲了三句反对毛泽东的话，才十七岁，也枪毙，立即执行。

死刑人数的决定，原本应该在中央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杀人不够，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将权利进一步下放，就像现在承包公司一样，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数字的任务。当时所谓杀“现行反革命”，到地方上，就成了公报私仇的泄怒渠道。】———知识分子张郎郎

【查金华是南京第一个被枪毙的，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 《 》 126 页，朝华出版社，1993 年 1 月）

1970年2月12日，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报道公判大会，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当天夜里，陈卓然、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 随后始作俑者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

遇罗克：
遇罗克是活跃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名造反派，他反对老红卫兵与西纠、联动的血统论言论，因此选择造反，并写下了著名的《血统论》、《出身论》以及《工资论》。
然而，由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反对《出身论》这篇文的几个观点，强调家庭出身还是对人的思想立场有影响的，要反对的应该是血统论。并宣布《》
在70年一打三反中，遇罗克也被杀害。

【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零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零年六月枪毙了他。】

【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

“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

“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著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

“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

《》

一九七零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

【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一位退休了的知识份子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如今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月亮没有封建主义月亮好”，于是也成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被罚扫街，一直扫到几年后文化革命结束，街道为他“平反”为止。】

【“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杨曦光（杨小凯），极左造反派

5.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复活，林彪集团的红色（白色）恐怖

在当代国内外许多“伤痕文学”中刻画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大约70%都与清理阶级队伍和前文的一打三反有关。

自68年开始，被林彪集团和军方掌管的革委会开始对中下层造反派、知识分子、文化领域重要人物进行镇压。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革委会内外的地富反右坏（也就是出身不好的，和一些曾在国民党时代有活动的）清理出去。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地富反坏”出身的知识分子恰恰许多是造反派、逍遥派的组成部分。

这场运动造成了一百多万人死亡，为此毛泽东在这场运动后期不得不降火，提出：“我们不是靠杀人统治的。”

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被批斗的人往往会被扣上“国民党反共复国军”之类的帽子，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屠杀的执行者一般是“工宣队”或者“军宣队”。

著名的“广西文革屠杀”“广东文革屠杀”“青海文革屠杀”“滕海青内蒙文革屠杀”等都在这一时期。林彪军事专政对造反派与群众的屠杀力度和血腥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刘少奇的工作组专政，超过了老红卫兵高干子弟的“红八月”，更远远超过保皇派与造反派在68年之前的武斗。

还记得知乎上有一个梗，叫“相约六八”，指很多 49 年留在大陆的科学界文艺界人士都没能活过 1968 年。

不作死就不会死，49年入国军还真就吊打50年代回大陆

萧光琰，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美孚公司化学师1951年回国，中国石油产业奠基人，1968

董铁宝，计算数学家，曾参与世界上第一代计算机研制1956年回国，1968

周寿宪，密歇根大学电讯系博士1955年回国，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创始人，领导研发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968

虞光裕，麦克唐纳（麦道）公司飞机设计师，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奠基人，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1968

陈绍澧，衣阿华州大学化工硕士1950年回国，中国润滑剂研究先驱（奠基人），1968

周华章，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1953年回国创建清华大学统计学专业与计量经济学专业，1968

林鸿荪，布朗大学数学硕士1950年回国，中国流体力学奠基人，1968

程世祜，伊里诺伊理工学院力学博士，1955年回国，结构力学专家，1968

陈天池，路易斯安那大学博士，南开大学物理二系创始人，1950年回国，中国近代有机化学奠基人，1968

————张广为流传的截图

那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 **1968** 年就是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年份，而那些人基本都死于这场运动（老舍是 1966 年死于老红卫兵）死亡名单中的不少人在之前的夺权阶段，其实是同情甚至加入造反派的。

下面是一些例子：

【饶毓泰，1891 生，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 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 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理阶级队伍”时，饱受折磨，1968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51 号楼自来水管上上吊自杀身亡。时年 77 岁。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 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 eniac 的设计编程。1956 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清队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审查，1968 年 10 月 18 日，上吊身亡。

赵九章：1907年生，著名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1949年后筹组并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担任国家科委气象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60年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68年10月10日在极度绝望中服药自杀。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其中有“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真菌专家邓叔群，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等。

李广田，著名作家。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1968年投水自杀。

傅雷，著名翻译家。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8年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受尽人格凌辱。9 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广东和平县，“刮12级台风”全县共有38000人被揪斗，其中750多人致伤致残，249人非正常死亡。中、小学教师是清理重点，被抓起来“审查”的占教师总数的38.5%。

体育界也受到冲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1959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1957年他归国时才19岁，也是“特务”嫌犯。1968年6月20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30岁。

在江西的水电部某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开展“三查”运动以来，这个工程队有两人自杀。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肠子一节节的被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两旁各个办公室的门口围观的人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在走廊上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另一个自杀者在挨斗的时候，趁上厕所之机硬是用砖头将一枚铁钉打进头部的颅腔，另一枚打进一半就倒下了，死于送往医院的途中。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化学博士。本来在美孚石油公司任高职。1950年怀着爱国之心从美国归来，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怀疑和冲击。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把萧光琰抓进“牛棚”，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的财物。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已经死亡。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自杀。他刚刚48岁。工宣队宣贴出了“特大喜讯”的大标语并通报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1968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以“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在军代表刘万泉的领导下，“红梅剧院”（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文革中改名为“红梅剧院”）对她大会批、小会斗。为了达到摧残心灵效果，让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场，一同接受批判。

根据省军管会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专案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样板戏、潜伏特务三大罪名。 1968年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写遗嘱，准备彻底解脱。严凤英死后，其遗体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

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

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天地翻覆》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工人阶级，不是知识分子！

很抱歉，工人阶级也要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18岁的都要“过筛子”。

1968年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油矿革委会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揪出了一些敌人，可以说只挖了几尺深，面上的敌人好挖，十二级台风把他们一刮就刮出来了。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挖两千多，不算多。”

“我们把原封未动的旧企业接过来也原封未动地接过了特务组织。”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通过对老技工朱迪清严刑拷打，逼出了所谓“俞国安特密小组”。又将已经调走的原厂党委副书记聂鸿信揪回来，连续审问17个昼夜，用18刑具、60多种刑罚，逼着聂鸿信交待出了247个特务。

46

结果，4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数百人被毒打，几千名亲属受株连。

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突出贡献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牛棚”里关的人越来越多。军代表在群众专政大会上讲：“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 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

当时这个工程处担负着国家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公司的第三工程处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 150多人，会影响工程进度。但是，“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已超过了150多人，此时军代表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

第二天，苏联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军代表断定，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楚。于是，一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公司很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曾在苏联学习过。去过苏联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也不放过。被抓的人，已达到了17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以上。几年以后，经复查，当时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风捉影造成的冤假错案。

从1968年9月12日到10月19日止，14个公社（镇）的群众专政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名，用梭标等锐器，杀死202 人，被害者最大的81岁，最小的9岁。宁冈县葛田公社葛田大队，在1968年的“三查”运动中，逼出“反共救国团”，将91人打成 “反革命”，设立监狱58间，刑讯逼供用了42种刑罚，11人死亡。奉新县甘坊公社揪出905人，打残、逼死73人。宜春地区在 “三查”和“一打三反”中，错定“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集团”644个，“反革命分子”3384人，错划阶级成份7709户，错定 “四类分子”9793人，非法抄家39002户，“群众判刑”4512人，被迫自杀4378人，被打致残217人。】

广东省：以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同样是军方、林彪死党）带领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广东大杀黑五类分子，血腥镇压广东造反派组织“红旗派”。许多尸体居然飘到了香港！

[illegible]

工商日報

大陸歸客揭露恐怖浮屍來源

肇慶武鬥出動槍械 西江沿河浮屍處處

潮水高漲直冲厓門漂到……

【本報訊】恐怖浮屍，源源來港，使人多方猜測它們的來源，本報綜合各方面消息，這次共匪殺人如麻的慘劇，乃是西江及珠江流域武鬥的結果。

據返鄉人士分別透露：在肇慶一帶，武鬥情況慘烈，而在新會的厓門海面，浮屍處處，令人差點不敢渡河。

據悉：各地「革命委員會」鎮壓武鬥的手段，現已失效，武鬥中重新使用槍械。為了防止武鬥份子破壞交通，廣九鐵路沿綫現已屯駐重兵。

另一項消息稱：廣州市擠滿由各地逃來的難民，到處行乞，該等難民多自湖南逃來。

據一位熟悉地理形勢的人士稱：目前衆多的浮屍飄流至青山灣一帶，已可肯定是從珠江三角洲流入。但是，由於返鄉客目擊厓門及萬頃沙一帶海面浮着更多的屍體，更使人肯定該等屍體乃由西江飄來，因為，西江上流水漲，水力甚強，照往年春末夏初，西江之河水，直接冲入厓門，水勢看，能夠把如此衆多的屍體流入青山灣，非西江之水，沒有這種動道。厓門的水應流入萬頃沙及虎門，然後直出青山灣。故此，浮屍從來自西江，已無可置疑。

……其狀可憐。該來客又稱，廣州市的武鬥，非常激烈，槍聲處處，亡命的羣衆在街頭街尾，毆個不休。為了防止武鬥禍及交通系統，共軍已出動防守各處鐵路站。大批共軍且已駐在石龍，以該處為東莞及寶安縣的共軍總指揮部，派遣共軍駐守樟木頭、布吉、平湖及深圳各站。來自內地消息則謂該種兵力之部份全為應付逃向香港的難民潮。樟木頭前進指揮部軍司令官係一個少將，受命攔截民兵與難民逃港。他綜下軍力控制範圍及於中英邊境。另一任務乃保護廣九鐵路。

廣州軍方情報指出：反毛派將於下月初旬作攔斷該通到香港鐵路綫的嘗試。故此，共軍之出動，實屬防變之部署。

另悉，廣東省派系劇烈鬥爭影响下，各地工廠多告停頓，生產銳減，最近各類罐頭食品運……

港海昨續撈獲浮屍三……

總數已達廿……

澳門昨續發現同類……

這具女屍，昨晚在長洲海面發現，雙手及頸皆被綑綁，左腳掌已缺，面目模糊，但法醫已驗出是女屍。

身頸及雙足被綁的一具浮屍，昨由四號水警輪在赤立角撈獲，膝部有偌大黑瘀痕。

從這具浮屍所穿的「列寧裝」，可推測為一名共幹。

連日撈獲……將在沙……

6.[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1969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97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1[illegible]

[illegible]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

在事后周恩来个人的披露中：对九大党纲的起草，林彪与陈伯达私下写了一个“否认继续革命理论”版本，而毛泽东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了一个现行版本。
毛泽东最初让陈伯达起草报告，但陈伯达在当时与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已经有矛盾，陈伯达私下对下属表示“文革不可持续，经过几年的大革命，现在任务应该是大生产。”

同时陈伯达试图索要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却遭到了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的拦截，不能定期交稿。最后戏剧性的张、陈各写各的，并把矛盾闹到毛的那边去。在之后由于名义上要由林彪负责挂帅报告起草，林彪就做甩手掌柜将报告起草交给陈伯达。

最终，毛选择了张、姚的稿子。

再之后，陈伯达与张春桥爆发了短暂的辩经，陈伯达指责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是伯恩施坦路线，搞“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后两者反过来指责陈伯达搞唯生产力。毛站在张春桥一边，并批陈伯达为两面派。

总而言之，林彪本人对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并不认同，而他在九大报告上表现出的不自然，再加上和陈伯达这段时间的关系。让毛对林彪是否愿意继承“继续革命”理论产生政治上的怀疑。

以上观点，源自林彪集团内的人物李作鹏的分析，当然，这只是毛林决裂众多说法之一。

对于江青和林彪集团什么时候分裂，并互不顺眼，这里个人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答案。
《》 “拥护文革的当权两派 ”就因为各种各样的恩怨（如杨、余、傅事件）而越发结仇。
在林彪集团（包括叶群、吴法宪等人）眼中，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不过是政治上的“暴发户”。

与之相对的是，江青等人也早就对中国实际上这套“军事极权”制度极为不满。因此，双方在针对九大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江青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革委会内部的群众组织（也就是亲四人帮和支持三结合的造反派）进中央。但这一建议并未通过，因为这些人很多连中国共产党的党籍都没有。

在正式投票前，林彪的妻子叶群也私下里对吴法宪表示过对江青的不满：江青这个人太狂了，要杀一杀她的威风。

于是吴法宪指定军队里的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最终投票结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分别少了八票、十票和十票。而且三个人的名字上还被打了个大叉叉。导致江青大怒。

这还没完，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毛、林、康生、黄永胜人又围绕名单上是否要加入叶群和江青的问题而互相试探底线，毛泽东主席当然也早就知道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不和，早在三支两军刚开始时，江青便希望能控制队内的造反力量，因此很快与事实上内心深处抵触文革的林彪起了冲突，差点闹到他那边去。

此时在党内，事实上毛泽东和江青等也都知道军队在各地镇压过火的行为，也开始逐步担心“军政府”的问题。
1968年夏，江青曾经怒骂黄永胜：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搞军阀专政，你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

然而，第九次党大会后，新的政治局委员共21人，11个都是军人，整个国家进一步朝着军政极权滑去。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引用苏联人批判中国搞“军事官僚专政”的讲话，表面上看是在调侃反对苏联的污蔑。
实际也说明毛主席也认识到军政府化的危险。

根据随行记者回忆，九大后不久毛到武汉访问，走入大厅，走廊里是巨大的毛主席照片，随后他又走入客厅、书房和卧室。

整个房子到处都是他自己的画像和语录，突然毛泽东生气的要求工作人员把这些个人崇拜的画像和语录摘下....此时的毛主席开始逐渐反思林彪用对自己个人崇拜来实现政治野心的负面影响。

（2）陈伯达炸平庐山

在之前我们提到陈伯达和张春桥产生了矛盾，在之后由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陈伯达这位同样是笔杆子的人物却开始和林彪走的越来越近。而聚集在林彪、陈伯达旗号下的还有陈毅以及不明真相的党员们。

庐山会议的一大议题是新宪法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简单来说就是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主张设。而林彪核心派别的人事实上为了保住和试探林彪继承人的地位，疯狂的要求毛接任国家主席。

汪东兴：“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摆？”

而张春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一派的人抓住这一机会，想把张春桥等人赶下台，黄永胜对李作鹏说：“现在有人（张春桥）借毛主席的谦虚反对毛主席。”

除了国家主席争议以外，庐山会议还涉及到毛主席的“天才论”问题。

林彪此时希望继续像往常一样无底线的吹捧毛主席，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吴法宪代表林彪，要求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国务院，而张春桥和康生反对。
为此吴法宪指责张春桥是不是“借毛主席的谦虚反对毛主席”并表示“毛主席是天才”是林彪的话，并质疑反对这句话的张春桥是不是要反对林彪，在此问题上林彪对吴法宪的态度表示支持。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早就不再信任林彪，正如他事后对斯诺所言：“四个伟大统统去掉，讨嫌。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要降温了。”

他亲自将林彪对自己过度吹捧的副词删掉，即“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将人民大会堂内的语录统统摘下。而林彪一行人对此没有及时察觉，吴法宪甚至误认为这是张春桥在捣乱，并到周恩来那里去质问。

而林彪仍然在继续试图用个人崇拜来麻痹毛，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上他说：“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

“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我有一点看法。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延安召开七大时提出来的。

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的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就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提出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林彪以为是张春桥）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

在场所有林彪嫡系都听出林彪是在指责张春桥，仅仅是一通阴阳怪气的讲话就让他们很是兴奋。他们开始商议要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不同分会上拥护林彪讲话，宣传天才论，以此来炮打张春桥。

24日，在会议上，陈伯达对张春桥先是不点名开火：“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

此时，同样看张春桥和老中央文革不顺眼的陈毅元帅也站了出来，跟风开火：“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

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
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

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

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

华北组二中全会第六号会议简报描述：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

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8月25号，在华北组的讨论中，发言者们都狂热的拥护林的天才论，要求揪出那个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野心家”。紧接着一名中央委员高喊：“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坐在张春桥旁边的陈励耘站起来冲着张春桥大喊：“自己站出来！” 张春桥脸色难看，这时浙江省以为候补中央委员索性站起来带领全场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邱会作回忆说：从24日那天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烧得很旺盛。这实际是对中央文革进行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邱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行动。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各写一封信给毛、林、周。要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浙江的南萍、熊应堂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

李作鹏回忆说：“讨论一开始，中委们就见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发言，每个人的发言声音大，调子高，措词激烈，‘机关枪’、‘大炮’、‘剌刀’、 ‘手榴弹’同时使用，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事后，周恩来曾经总结这一次庐山会议，是“八月顺流和二月逆流合流”，指的便是代表文革后被边缘化的老干部陈毅与陈伯达，在反对张春桥问题上的合流。

对于庐山会议的灾难，毛泽东评价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就像当初二月逆流一样，他将陈伯达和其背后林彪集团的在庐山的所作所为视为对文革的抵抗。甚至气得要求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事后，林彪只能以吴法宪是个大老粗而替他找补，至于陈伯达则被毛泽东指责“背叛中央文革”，要去到江青、康生那里承认错误。

随后党内便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而毛泽东也开始正面的对林彪进行敲打。

（3）毛泽东南巡倒林，林彪叛逃

庐山事件后，毛泽东彻底下定了废掉林彪这一接班人的决心。

【1971年8月，毛泽东开始对林彪势力采取行动，具体措施是“甩石头”（指批文件和找人谈话）、“掺沙子”（派出非林彪系官员渗透其中，主要指本来由林彪势力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和“挖墙脚”（改组部门，主要指北京军区和卫戍区）】

随后在1971年八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南巡各省，开始适当的披露他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并为倒林做舆论上的准备。

8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发表讲话：“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的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缔造了就不能指挥了？”

8月27《》

8月31日，在南昌，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主动像毛检举林家黑料。此时吴法宪连续给林彪妻子叶群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和行踪。

9月5日，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秘密为批林吹风，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做了会议记录。同日，李作鹏到武汉得知毛的谈话内容。

9月6日，李作鹏将毛的谈话谈话转告给黄永胜，再由黄永胜转告给叶群。当晚，林彪儿子林立果从顾同舟那里那里得到讲话文字稿，并整理五十多页。

在林彪即将倒台的最后几天，林彪的心态近乎就要麻木了、认输了，在家里窝着什么都不干，甚至没有叶群和林立果积极。

9月8日，林立果决定刺杀毛泽东，他与他的小舰队成员商量暗杀手法，包括但不限于用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高射炮、手枪近身、铁路放炸弹等。然而这些计划全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施可能性。

官方历史宣称，事后找到了林彪亲笔写下的手令“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但目前许多民间史学家怀疑手令的真伪，因为这与其他史料中林彪的活跃情况不符。

9月11日，内勤听到林彪对叶群说：“反正活不了多久，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9月12日，毛泽东与党内中高层干部谈话，批陈伯达，此时距离林彪出逃仅剩一天。中午1点到达丰台，并要求38军调师到北京郊区南口。
晚8点左右，周宇驰对“小舰队”宣布要南下到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要绑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上飞机，并安排一架飞机接上海小组到广州。
晚8点15分，林立果做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南逃广州，并与母亲叶群密谈。
晚9点20分，周恩来秘书接到电话，林彪女儿林立衡说林彪要出走。晚10点，林立果与林彪谈话，林立衡（林豆豆）听到林彪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晚11点，周宇驰的电话打来，宣称南下广州的飞机都被周恩来控制。
晚11点30分，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问候林彪，并询问北戴河的飞机一事，并表示愿意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同志。
晚11点40分，叶群要求林彪卫士长李文普调车，林立果宣布有人要来抓首长，并通知周宇驰放弃南下，准备北上。
晚11点50分，一家人迅速收拾东西，加上李文普、刘沛丰一起坐上轿车。刚跑出去二百米，李文普要求停车，并从车里跑出来。随后两声枪响，李文普手臂负伤。
9月13日，0点22分，汽车到达飞机旁
0点32分，飞机强行起飞。
1点左右，周恩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是否拦截飞机。毛表示：“林彪还是我们的副主席，打下来不好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飞吧。”
1点52分，全国下达禁航令。

2点30分，飞机坠机，林彪一家在内所有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身亡。

7.林彪身后：

9月14日中午12点，周恩来拿到电报，得知林彪死讯。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

【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

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

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晚年周恩来》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已经建立党的委员会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即可撤销，军宣队立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军政体制终告完结。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新瓶装旧酒（1971–1976）

1.坠毁的革命

“那文件果然重要！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彷佛还可以听见橡胶树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知识青年黄子平

“在这之前，尽管“文革"搞得乱七八糟，自己也吃了很多苦，但总以为自己错了，没怀疑过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文革”，总是很真诚地检查自己。林彪事件以后，我才想，毛泽东也犯错误了。这个弯转得太厉害了，因为林彪做接班人已经写进了党章。”——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丁石孙

“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然后，心中的精神建筑也轰然垮塌。我现在回想那一刻，甚至还能听到那垮塌瞬间的轰然巨响。多少年来建立的精神信仰，就在这一刻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后来我问过许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 — — 青年职工鲍昆

昨日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全国各地找不出比他“更革命”的副主席，今日却成了叛国贼。
这样的冲击必然动摇人民群众和各级党政机关对文化大革命乃至对毛主席的信仰。

因此，林彪叛逃的消息在短期内并未通报全国，只在党的高层传达。但是敏锐的人民群众是能闻到异常的政治气氛的。以突出毛主席为由，各地林彪的画像被偷偷摘下。
北京城内“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标语也被涂掉，党政机关文件里赞颂林副主席与“亲密战友”之类的文字开始被删去。

直到73年，官方开始大规模的批林宣传。然而，林彪事件造成的结果此时已经难以挽回：群众对“文革”的态度越来越负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林彪搞了五年“个人崇拜庸俗化”后，文化大革命七年中的五年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像68年之前那样造反？别想了，老老实实每天打卡。干部做好“早请示晚汇报”，工人、解放军跳好忠字舞，人民背诵毛选老三篇天天读： “随机抽查！背错一个字当街揍你！”

牢记三忠于，四无限：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记住一句话，忠就完事了！

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当代大学生光是每周打卡一次《青年大学习》就叫苦连天，敷衍嫌弃。

要是让这帮大学生回到林彪军事专政时期的文革，与其说享受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键政”自由，《》，如果表现出抗拒，那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一个。

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就是文娱只有样板戏，上班上课上学全都是“毛选天天念，功力日日深”，真想要造反就会被军宣队镇压。

不许质疑、不许私下讨论、不许造反，再好的经也要念吐了。

所以，在林彪倒台后，当时亲历文革的群众才会对文革出现了普遍的厌烦情绪。

无论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是批邓反右倾翻案风。比起之前，群众和各级党政官员更像是应付了事，远没有先前的烈度。

社会上各个阶级，从文革前期挨造反派整的文职官僚，到中期挨军人整的群众与造反派，再到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以及从头到尾都对政治运动反感的军事官僚，整个社会对文化大革命整场运动的反感情绪逐年强烈，并且文革派越搞政治运动、喊口号提振信心，群众反而越觉得抗拒。对文革的信心碎了，怎么也拼不起来。

可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激进造反派长期受军政府压制再加上许多干部在复职后，腐败特权公然回归也引起群众不满。许多群众和前造反派仍然希望能通过“继续革命”，批判革委会内的官僚特权、重启文化大革命。

视角回到中央，表面上看在林彪摔死的那夜毛泽东同志表现得很兴奋。
但无论国内外各种立场的史书都会道出这样有趣的一点：在林彪死后，毛泽东的身体急剧恶化。

事实上，被动摇信仰的何止是人民群众呢？伟大领袖也会感到迷茫与绝望。

在林彪事件的四年以后的1975年5月18日，毛泽东与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一场对话道出他晚年的绝望心境：

【马卡里奥斯说：我读过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诗词，十分爱读。这些诗词中含有人道的感情以及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生活的概念。毛泽东说：“ 我不会写诗呢。 ”
马卡里奥斯说：不管怎样，你是在写诗词、书写历史并改造自己的国家。
毛泽东说：“ 没有改造好。 ”
马卡里奥斯说：中国正在为了进步、和平和幸福的未来而继续进行和平的革命。
毛泽东说：“ 想是这么想。 ”

马卡里奥斯称赞：“中国人民的工作热情很高。”
毛泽东说：“ 可能是做给你看的。 ”
马卡里奥斯说：塞浦路斯和中国相比，一个好比蚊子，一个好比大象。
毛泽东说：“ 蚊子比大象厉害呢。大象被淘汰得差不多了。 ”】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五年，对于文革早期就被边缘化的旧官僚来说，是一次“攻守异位”。

林彪集团在71年倒台，支左部队也在72年正式退出革委会，此时各级政府开始逐渐的向一般的文官政府职能过渡“复旧”。毛泽东开始大规模的允许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复职，甚至还对“二月逆流“事件进行了适当的“平反”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反复强调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对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要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关怀他们，教育他们，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就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可以说，晚年的毛主席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比1968年还要更加退缩与悲观。

虽然毛主席从未承认文革是错误，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但同时毛泽东事实上又觉得这一次的文革是失败的。

到了晚年，毛泽东既希望暂时不要再“天下大乱”，同时又希望保住四人帮与造反派这样的左派力量。并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遗产传承给后人，最后经后人手中实现文革的愿景。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58

【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
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

无论如何，即便毛对未来一代年轻人与文化大革命还抱有期望，但至少当下，他必须与旧官僚做出妥协！
而有着灵敏政治嗅觉的邓小平，可能也预见了这一变化。

1971年11月，远在南昌拖拉机修造厂的邓小平夫妇得知了林彪叛逃的消息。邓小平知道，一个机遇正摆在自己面前。
两天后，邓小平亲笔写下一封信并交给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汇报自己在江西的劳改情况，并提出希望出山做一点具体的工作。

2.斗争双方的重新洗牌

在中央，周恩来自建国以来，首次当上了党内真正的“二把手”。虽然在大家的印象中，周总理一直都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实际上判断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条件，是看其能否在话语权上能与一把手“掰手腕”。

在建国初，真正的党内第二把手是刘少奇（中间还遇到高岗同志的挑战），再之后则是林彪。在过去，周恩来虽然也能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国务院更多的是“执行政策”与外交，而现在，国务院系统已经可以更加独立的决定政务。

在71年、72年后，随着领导干部们逐渐摘帽子恢复工作，进入革委会。他们与他们自己在文革前的许多特权也得到了恢复。

按照当时的说法，让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文革早期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也全部属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搞工农兵推荐制度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以及促进教育公平，让工农子女有直接上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两套制度实行以后，由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因此很多干部与军方的子女靠着名义上参军入伍就逃脱了上山下乡，只有没啥背景的学生造反派和知识分子不得不下乡。

而农村地区往往由保守的党政官僚把持，他们面对这些不听话、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与出身不好的学生很是神气。殴打虐待，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只给予很少的工分（甚至不能维系自己的日常生活），此外还经常出现女性知识青年被强奸的现象。

那些红二代与干部子弟们却能被安排进入军队，让他们在未来的政治前途上有了更加优先的地位。如韩先楚的福建军区曾经任命安排了200 多个高级干部的子女。
随着干部复职，这些干部也会依靠权力和关系把自己上山下乡的儿女们捞回城市。
“老子解放我解放，老子无权儿无望”

此外，工农兵推荐制度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领导手里，因此原本让贫苦人上大学的制度，却成了许多干部家庭孩子们的捷径，走后门成了 70年代的普遍特征。对此江青同志非常不满，要求“批走后门”，但毛泽东担心这样会打击干部复职后的社会稳定而选择阻拦，他表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时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钟志民觉得自己“走后门”上大学不光彩，就给学校里打了报告，要求回到下乡插队的江西。他真的退学下乡了。这个事情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民日报》作了突出的报道。】

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年以上，可特权仍然横行，理论与现实极度矛盾。

而现在，林彪摔死了，老干部却回来了，特权也恢复了，这进一步造成了人民群众对文革以及革委会现状的不满与麻木情绪。
所以社会上才会逐渐产生两种思潮。

第一种是：累了，文革搞了七年屁用没有，革委会还是那个逼样，文革早点结束吧，这样就不用天天念经了。

第二种是：这恰恰是因为文革没有进行到底，所以要紧跟江青同志把文革进行到底。

因此全国上下很快分出了新的两派：

第一派是保卫文革/继续文革派，简称“文革派”，当时在党内则习惯称作“上海帮”。（四人帮这个词是在74年后才被毛泽东提出，在毛泽东死后作为给文革派借坡下驴扣帽子的蔑称）
在林彪倒台和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很多此前在林彪军政时代因“清查516”受到军方排挤边缘化和清洗的造反派，终于熬出头，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四人帮等前中央文革势力也抓住机遇，重新与这些还愿意继续革命的造造们结盟并形成一派。希望能保卫文革现有成果，保卫革委会制度，并继续批判、揭露干部的特权与官僚主义。

第二派则是结束文革派，后世人往往也会称他们为“务实派”、“老干部派”。

在林彪倒台后，很多文革初期被冲击下放的官僚们逐渐都恢复了职务。虽然名义上在毛泽东去世前无人敢正式否认文革，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明白，这些恢复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革极度不满。这些人很快心理上团结在以周恩来同志为核心的国务院，对革委会体制进行朝着旧文官系统的改制。而民间同样有因对军政时代革委会的不满，转而对整场文革都产生恨意，从而要求结束文革的声音。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五年比起前五年，少了许多血腥气，但暗地的“文斗”倒是不少。反对文革和继续文革两种思想在社会和民间都不乏有民意的支持。许多人往往是既对文革的前途感到迷茫，又讨厌干部特权回归。

3.马蹄铁之争：批林整风

林彪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个问题到了当今仍然是一个争议话题。
“军队镇压造反派，那林彪当然是极右。”
“林彪集团冲击旧官僚，紧跟毛主席，那他一定是极左”

而文革的后五年，对林彪问题的性质则不单纯是一次辩经，而是两派踢皮球的政治较量。
在“保卫文革”的解释里，林彪是犯了极右错误。
在“结束文革”的解释里，林彪是犯了极左错误。

两种解释的本质，是用死人压活人。周恩来一派通过说林彪是犯了极左错误，把林彪集团整人说成极左模式，来敲打试图继续搞政治运动的造反派与江青集团；相反，把林彪集团说成极右错误，造反派就能光明正大的掀起第二次“反复旧”的高潮，重启1968被中断的文革。

虽然从实际而言，两派所批评的“林彪集团错误”，指的都是革委会军政府的极权，和变着花样的整人。

【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周恩来对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示说，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领导干部时的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也强调要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

“林彪是你们（造反派）的老祖宗，不批你们批谁？批极‘左’就是批林彪。”——孔庆德评价武汉造反派

毛泽东也知道周恩来批林彪的极左，本质上是在否认文革。就连王洪文同志都一语道出：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2年国庆社论，周恩来同志监督起草，起草小组写下：“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 这引起姚文元同志的警惕，姚文元亲自划掉了“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这句话。于是周恩来反击，在文章里加上：“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即治病救人）、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周恩来批示同意。
张春桥批示：“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 江青批示：“批林就是要批极右，同时要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

最终在1972年下半年，由于“王若水上书”事件，对林彪的定性问题党内爆发了大论战。

【姚文元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
张春桥说:“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
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
是敢提意见。”
“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 “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12月15日，毛泽东正式为林彪问题盖棺定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从舆论战的角度上来说：这次保卫文革派赢了面子，在毛主席的定论下，全党全国开始批判林彪的极右错误。

与此同时革委会的“复旧”却在迅速发展，结束文革派赢了里子：12个部委与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得到恢复，革委会中军队撤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基本全部恢复原职。

4.邓邓邓邓邓～～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毛泽东

随着周恩来话语权的增大与其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越发明显，对周恩来的制衡与敲打自然是必然。

1973年3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名义上要辅佐周恩来的工作，实际上接管乃至架空了部分周恩来的权力。

在当今很多人的印象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经常被相提并论，总认为他们是党内的“开明派”“老右倾”“走资派集团”，总是以政治盟友的面貌示人。

然而实际上，邓小平那时并非是周恩来的政治盟友，而是毛泽东的政治盟友（至少在毛发现邓有更严重的反文革倾向之前）。

毛泽东对邓小平在73年时，还是比较信任的，即使他知道邓小平爱搞“猫论”。但邓小平是从20年代末在所有问题上都坚定站在毛泽东个人这边的“铁杆毛派”。
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邓小平是一个“相对更信任的走资派”。

尤其在毛泽东晚年，他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自己走路、说话口齿不清的老人，说不上哪天会撒手人寰，因此“确保经济整顿，与“继承文革思想”这两件事的交班问题更为紧迫。

他寄希望于：邓小平能够接班周恩来这两年的经济整顿工作，同时又要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能复出工作，靠的就是那句最大的承诺：永不翻案。

【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

1973年11月13日到14日，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苏联霸权主义的优先军事威胁下，中国开始由“反帝反修”转向“联帝反修”。基辛格透露勃列日涅夫曾对美方表示，苏联对中国有核平计划，要直接摧毁中国的核武能力。

因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将中国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基辛格还提出，愿意偷偷给中国提供卫星监测技术，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直接建立一条热线，共同防御苏联的核武威胁。周恩来与叶剑英与基辛格之后达成了初步协议。

然而，毛主席对此很不快，认为与美帝国主义走的有点过近了：“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

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周被戴上"右倾投降"、”卖国”、“给美国人下跪”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许世友还骂周恩来“甘当儿皇帝”】

【“我周恩来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在会议的最后，邓小平也参与了批周，他警告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在这之后，周恩来一定程度上失势，批斗结束后他的身体状况也开始加速恶化。

毛泽东的晚年也曾寄希望于邓小平能够“容忍”，以及支持如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代表，实现邓小平、华国锋、王洪文这样的人的“老中青三结合接班”。

他对此嘱咐道：“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指王洪文），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洪文宣读党纲修改报告。这个会议规定了十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中工、农、解放军、其他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比例。

【出席十大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军队代表的比例由九大的28%降到16%；干部代表的比重由九大的 12%上升到19%。】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5.批林批孔，评法批儒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毛泽东

（1）为什么要集中批孔？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反对孔家儒学的，但将批孔与批林联系起来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还是第一次。至于为什么要将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今还比较模糊。

而主流社会的看法则将理由归结到两件事：
1.在林彪事件后，中央对林彪进行抄家，搜集证据。发现林彪家里挂着一幅“克己复礼”。 2.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他写的《571工程纪要》中将毛泽东骂作“秦始皇”。

《 571工程纪要》，该纪要是在1971年3月时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圈子创作，撰稿人是于新野。这份纪要用较为直接的方式辱骂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国起义推翻他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 …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 —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 …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这份纪要在中央获取后，被作为林彪搞政变的罪证。但贴主个人也倾向于认为林彪本人并未参加该份纪要，因为这一方面并不符合林彪的个性，另一方面这份纪要的行文充斥着一种年轻人希望号令天下的热血激情，这一点也能从各大高校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政治宣言中品味出来。

此外，这份纪要写出来时距离南巡倒林与九一三还有足足六个月，因此个人倾向于这只是林立果小圈子里的一次意淫口嗨政治宣言，其实际意义约等于当下互联网反贼写长文希望打倒某某某。

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将该纪要作为罪证下发，然而毛泽东却坚定要求下发该纪要全文到基层每个干部。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571工程纪要的下发的确造成了群众的“思想混乱”，许多人私下里居然认为林立果说的话有道理，社会上要求结束文革以及因林彪事件而对毛主席产生怀疑的议论声也逐渐增大。

而在该纪要中将毛泽东与代表法家的秦始皇类比，被许多人认为是将林彪与孔子并列批斗的原因之一（虽然原文其实也提到林立果认为毛泽东行孔孟之道）。而对这个看法的支持来源于毛泽东在批林批孔时期的讲话：

【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上一个A，变为China。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到了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表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主张按法家的依法治国，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1974年1月18《》
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就木即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2）重论中国历史，评法批儒

---- 1950《》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历史故事。描绘的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秦王嬴政，顺应历史潮流，准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奴隶主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阴谋策划，派跳梁小丑荆轲刺杀秦王，秦王识破阴谋，把荆轲当场斩除，给了奴隶主复辟势力以沉重打击。

-

---1974年连环画《秦王斩荆轲》前言

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是宣讲“儒法斗争史”，学者们将中国历史重新编写为儒家与法家两种思想贯穿两千年的斗争历史，同时认定法家是代表进步的力量，将中国历史上所有有作为的人物都说成是法家思想者。

当今许多学者相信，用儒法斗争来解释古代历史，其本质在于通过历史映射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党内路线斗争。即将法家对应党内的“左”派，主张激进手段的改造社会，而将儒家对应党内如周恩来、刘少奇、林彪这样的反文革的“右派”。满口为了人民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在巩固反动的旧生产关系与制度。

对于这样的解读，我不做评价。

但总体而言，批林批孔运动相对先前的政治运动来说更为和缓，更像是一场看书学习运动，各地单位都被要求补习“儒法斗争史”，成立批林批孔理论小组等等。

批林批孔时期虽然也有在当代人眼光里过于上纲上线的政治迫害与批斗，但总体来说并没有之前在红八月、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各地农村文革时的血腥烈度。受害人通常只是被撤职，或者进监狱。

（3）造反派的复兴

在这一时期，面对社会各界与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七年来的成果越来越怀疑的现状，文革派不断尝试开动宣传机器，发动革委会内外的造反派起来继续保卫文革。

1974年1月14《》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的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

“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造资产阶级的反有什么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

在这段时间，许多各省原本的造反派头头们也都被解放。这些人多为在之前被扣“五一六分子”、“北决扬分子”等极左派帽子的激进造反派（通常真极左依旧不予平反），这些造反派出来后也很快重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内唯一能帮助他们的四人帮麾下。努力的保住自己在革委会的地位，并尝试复兴文革早期的理想主义。

□□…□□□□□□□….

恐怖主义怎么你了？
红色恐怖万岁！
城里放冷枪打死你个死妈东西
我不同意60年对农民工精减的决定
我不想为国家着想
现在就把缺的工资补给我，不然就杀你全家
天天在城里打游击
有段时间没洗澡了
杀光一切
资本家
郝广德，你这投靠贱畜军逼
滕海清的叛徒不得好死
从北洋时期传下来的驳壳枪
杀过袁匪、杀过日寇、杀过蒋匪
毛泽东又怎么样？
毛泽东能现在就给我送钱送枪送炮吗？
什么时候v我50w干革命？
从12级干部身上抢的衬衫
狗日的王良太，狗日的柳青
他们把韩桐小哥枪杀了
要么你现在把工人全部提高到四级标准
然后补全所有工资和奖金的差额
要么我们现在就把你杀了然后丢尽日本法西斯留下的万人坑
犹太忠，你的回答错误！
吴涛，你有底线吗？
郑维山，你这个狗日的林婊走狗！
炸弹马上送进你们的办公室！！！

□□□□1968□□□□□□□□

1972：儒法阶级斗争
上海市批林批孔办公室干部
工龄23年，党龄8年
跳梁小丑全向东
之流必将灭亡
革命人民要拥军爱军
在上海建立公社组织是路线
错误，我们要拥护三结合
一打三反纯净了党
纯净了群众组织
学习林司令员，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清理阶级队伍是伟大领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央作出的决定
要坚决贯彻和执行
清理行动有利于群众组织吸收新鲜血液
不对，林副现在是极左
分裂派亲苏叛徒了
肉麻的举报信
厂长居然让我加班
他一定是邓二派来的走资派
五一六分子又冒出来了
这帮诬蔑千古完人周圣人的狗畜生
我的大字报怎么被人撕了
一定是有儒狗窜入党内了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爹，我早就是法家学派了
学生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建设边疆、内地

造反派（1972）：军哥摇了我吧

武汉：
武汉与上海是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造反派比较热衷继续革命的两个地区，后者因为是文革派的老巢，因此在林彪专政时期得到较好的“呵护”。

【1972年3月至1973年2月，复查了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嫌疑人，最终得出结论：在33659名嫌疑人中仅有177 人曾加入“北决扬”，受害者被通知，他们不再被视为嫌疑人。
1973年1月，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军方代表）回到军队，王克文（干部）由省委书记调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3月4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七条”），承认省委在两清中出现错误。3月16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六条”），承认湖北的两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点名批评曾思玉。】

在林彪倒台后，一直压制造反派的武汉革委会官僚尝试夺取“批林批孔”运动的解释权，试图将林彪说成造反派与极左派的黑后台，引起了武汉造反派的强烈不满。

【顾建棠回忆：他所在班的杨世华班长反复向他们宣讲：“学习班的任务是批林整风，批林彪的罪行，整自己的风，所以要把自己摆进去。”

“武汉有个北决扬，曾司令员讲了，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 “五一六的后台是陈伯达，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才是五一六的总后台。”

顾建棠发言说：“经班长多次开导，我懂了，参加批林整风，我们应当将自己与五一六联系起来，再与陈伯达联系起来，然后与林彪挂钩，把自己摆进去，我们的风就整好了。是这样吧？”

他和湖大的梅子惠、华工的赵文成商定，“要控诉自己多年挨林彪集团的整，戳穿他们借批林为名把我们打成五一六的鬼把戏。” 他们发言说：“陈再道对我们武力镇压，死的死，伤的伤，有厂难回，有家难归。” “林彪死党刘丰借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狠捅革委会的马蜂窝，死整所谓马蜂王，批的批，斗的斗。”

“刘丰以贯彻九二七指示名把我们打成北决扬分子，两清一批又把我们打成五一六分子。”

“先说刘少奇是我们的后台；陈伯达一垮，又说陈伯达是我们的后台；林彪倒了，又说林彪是我们的总后台。将来还有没有人又会成为我们的后台？我们到底有多少后台？”】

武汉造反派从1972年开始到1973年，开始重新演讲、贴大字报。大量揭发武汉军方与革委会官僚滥用职权（如将自己的家人安排到大大小小的职位）、镇压造反派，宣称要将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

这一阶段的造反派复兴被称为“反潮流运动”，主要由挨整的造反派中下层人物组成，而与之相对的是“主流派”，即参与革委会的名义上的造反派领袖们，主张合法和平的斗争。

而同时期，因为720事件而一起被关进监狱的“百万雄师（保守派）”们也借着夺权阶段林彪与造反派以及王力之间复杂的关系，试图为 720翻案。将中央文革的王力与造反派说成林彪的前台人物，并抵制由造反派主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4年初，原百万雄师（保守派）总站、分站一些头头在各区、各系统开大会成立组织，统一打出“工农兵”旗号，目标之一就是捍卫两清（清查五一六与北决扬）成果，提出两清“不能全盘否定、大搞一风吹”。

武汉反潮流派不断在当地示威游行上访，要求释放他们认为被冤抓的造反派头目“胡厚民”等人，地方干部以“等待中央命令”为由拒绝。造反派在武汉到处张贴巨型标语，游行队伍也越来越长，最终当权派妥协释放胡厚民、李想玉、魏绳武等人。

结果反潮流造反派“得寸进尺”，进一步要求释放更多的造反派。于是双方矛盾加剧，最终武汉造反派决定到北京请示并得到了王洪文的传话： “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希望你们体谅中央。”

… ….

6月3日，武汉市委宣布根据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宣布批林批孔必须要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统一进行，不允许自发组织和串联。

反潮流派抗拒执行命令，并在6月12日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经过“工农兵”广播站时，造反派宣传车不断喊口号：“720是铁案！永远翻不了。”

而在全国范围内，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实际上限制了造反派的复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希望把批林批孔变成“第二次文革”的造反派们很不高兴。安庆市重新组织起来的“安庆市工人革命造反串联会”在大街上贴出：“淮南在镇压，淮南在流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标语，并散发口号：“中央十二号文件是修正主义的文件！”、“揪出中央十二号文件的炮制者！”、“打倒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4）周恩来的被动抵抗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显得更加被动，如前文提到的“走后门事件”牵扯到江青批判叶剑英将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军区镀金一事，本身也是对周恩来的间接敲打。

这一时期江青与造反派对革委会特权的监督起到了强势作用，但这样的文攻客观上这又不得不造成对中央与各地经济计划的影响，尤其是被认为阻碍了1971年来中美关系改善的所谓“大好形势”。

蜗牛事件：
1972年，中国国务院决定从美国引进彩电技术。在考察团结束考察回国前夕，美方送给中方考察团送了非常多的玻璃制小礼品“海蜗牛”作为两国友谊的象征。

结果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时期，江青在得知情况后大发雷霆，认为美国人是在污蔑中国人像蜗牛一样搞“爬行主义”，甚至向美国驻京联络处（相当于建交前的大使馆）表示要暂停引进彩电生产。

之后相关部门连续召开会议，将此问题无限政治化与上纲上线。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为此只能立案调查，最终结果认为美方并没有侮辱中国的意思，不必退回礼品。但中国彩电引进却因此受到影响，延缓了五年左右。

《中国》事件：
意大利左翼导演曾经拍摄过纪录片《中国》，本身是作为宣传的目的。但江青认定这部作品“反华反共，丧权辱国、丧失立场、右倾投降主义。” 并组织了一场为期一年多的批判活动。

【影片被指控全盘否定、抹杀中国建设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同旧中国没有两样：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
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
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

甚至还揭安东尼奥尼老底说，他在二战时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权，在陆军中任职。

安东尼奥尼对此评价：“竟然将我和孔夫子、贝多芬相比，我个人认为不可理解。我认为这部片子，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周恩来认可的一部片子。很明显，周恩来与江青之间存在着斗争。”】

“ ” 《》《》

周恩来当场回击：“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意指江青批孔是从70年代才开始的，没资格自认批孔老臣。

— — — — — — — —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进入解放军305医院住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但因病情耽搁体内癌细胞早就扩散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开始尿血，肿瘤在身体转移。

同月，江青四处放风要批“党内大儒”。

到了七月，毛泽东主席开始担心江青与文革派对周恩来与干部的进攻过火，过于锋芒毕露。为此在毛肯定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的同时，也批评了江青的一些政治手段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

也许是感受到时日无多，晚年的周恩来愈发大胆的表现出对文革的反思与自己先前跟随林彪、江青揪斗干部的“黑历史”的愧疚，并开始尝试为一些客观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污蔑为叛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老革命干部平反。

杨成武回忆：【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

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下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

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

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

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74

此外，贺龙将军也曾经被林彪集团迫害，被诬陷“叛徒、特务”。1969年，在糖尿病恶化的情况下反而被注射高渗葡萄糖，最后被活活毒死在解放军301医院。

作为分管负责贺龙专案的人，关于贺龙所有通敌叛变的材料都经过周恩来的手里，包括批改对贺龙的审查报告等等。而周恩来事实上就是默许了林彪迫害贺龙。

直到林彪叛逃后，毛泽东承认自己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犯了错误。1974年，毛泽东要求尽快恢复贺龙的名誉。

周恩来就此开始为贺龙问题奔走，并亲自修订对贺龙的评价，强调贺龙同志“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表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一年后的1975年6月9日，贺龙追悼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对贺龙鞠躬九次。

… …

1974年9月30日，身材消瘦的周恩来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庆祝会。当周恩来走入两千人的会场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欢迎并高呼： “周总理！周总理！”
周恩来一个简单的祝酒讲话就被打断了好几次。

此时在社会上，恢复工作的干部、老革命、恢复名誉的知识分子以及反对文革的民间声音，都开始将自己对政局的不满以及其他情感投射到周恩来身上。

6.四届人大的组阁斗争

从理论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在此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需要再加上林彪事件，人大长期停摆。

直到1975年，为了新宪法的撰写与组阁新一届国务院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大正式召开。
在会议召开前，党内为了防止对方派系在国务院中占据上风又一次爆发争斗。

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远洋货轮，交给了交通部。
在轻载试航中，接船方发现风庆轮质量不过关，后来雷达出现了问题。虽然造船方对这些故障进行了修理，上海方面却认为交通部有意挑剔，不愿意用国产船。

交通部担心国产发动机不可靠，没有批准这艘船远航。
《》
交通部。

风庆轮于1974年5月9日从上海启航到欧洲，上海派了一些人上船，任命朱栋在船上任政委。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任命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任副政委。在船上，交通部的人和上海的人，由船舶质量问题争论发展到政治上的争论。

朱栋组织批判“洋奴哲学”，把买船还是造船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杨继绳当时从中国远洋天津分公司听到的情况是，李国堂不经意间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正值四届人大前夕，风庆轮事件被上升到政治高度，由于继续文革派（此时我们已经可以用“四人帮”来称呼他们了）对邓小平高度不信任，因此江青在十月份的会议上强迫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表态。

而邓小平则回答说：“要调查。”

这个回答显然无法让江青满意，江青于是追问邓小平对洋奴哲学的看法，后者不满的回应道：“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于是两人当场在政治局大吵起来，事后根据姚文元的日记，可以得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气的跳起来骂江青，脸都气的扭曲了。

【“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戴这样的大帽子，这会怎么开！”】——邓小平

在风庆轮事件后，事情走到了毛主席不愿看到的角度：江青与邓小平政治对立。
原本就倾向于老干部的邓小平一旦与江青对立，那么必然会在接班后彻底走向反对文革的态度。

这也是毛泽东在晚年至少两次对江青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以及强调政治局要团结的重要因素。

10月18日，王洪文给毛泽东上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对“毛派打毛派”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同时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四人帮其他三人的好话，希望组建新一届内阁，但毛泽东仍然希望由邓小平组阁。

“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重，因此副总理将承担日常工作职能，意味着谁是副总理谁就是事实上的总理。

12月23日到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继续谈到要限制“四人帮”的问题，要求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还希望他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此外，毛要求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但同时，毛主席在75年1月份任命王洪文为中央军委常委。

最终，如果只以四届人大的政府内阁人员来看，实际上四人帮占据弱势地位，副总理十二位里多数为反文革势力。

而在文革的最后两年，造反派们一厢情愿的想要“重启革命”的愿景已经成了乌有，当下的文革派以及四人帮在批林批孔反复旧失败已成定局后，更多的只是加强反修防修的宣传运动。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的嘱咐xN

7.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在四届人大后就到了邓小平正式亲政的时代，邓小平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整顿上。同时利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即：“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他的施政口号。

邓小平甚至把毛主席1956《》 75年时革委会中的文革派已经走入全面防守，唯一能做的就是搞搞宣传写写文章。

可即便如此，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干部团队眼中，要想发展好经济，“稳定大于一切。”就必须建立生产秩序，打压不顺从的造反派。

于是，在批林批孔后回到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在整顿时代，又又又又又一次被官僚们排挤出来，不被排挤的自身也已经腐化成了新官僚。

也是在整顿时代，邓小平开始有了自己的智囊团小圈子。他让胡乔木、邓力群、胡绩伟等人起草文件，批评造反派“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赶下台”。

并沿用保守派的一贯说法，将造反派说成：“他们的阶级基础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
可同时，邓小平却对知识分子摘帽问题采取了包容态度，强调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5年秋，邓小平叮嘱新上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抓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
同时，在整顿短短的半年内，邓小平已经在为之后的政治做部署。

在年初，邓小平就宣布要整顿军队，解决三支两军后军队臃肿腐败特权横行以及战斗力低下的问题，对军队干部实行大清洗。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及他信得过的老革命战友们。

最后，邓小平开始整顿文艺界，也就是四人帮能掌控的核心领域，要求扩大文艺节目搞百花齐放。

就这样，邓小平成了老干部、知识分子乃至对文革绝望的老百姓心目中自周恩来后的“新希望”。

8.批邓、反右倾翻案

邓小平的整顿比我上一个阶段用的文字还短。

在1975年中后，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开始向毛汇报邓小平的反文革倾向，并提及邓小平带起的这股风已经超过了 1972年周恩来带起的那股。

在另一边，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结肠癌已经核桃般大。到了夏天，周恩来的体重只剩下60《》

“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作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7月1日，周恩来与医院工作人员合影

9月20日，周恩来被抬上车准备送入手术室。

【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 “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

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

“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邓小平听罢总理的话，面部表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一下总理的手，未说什么话，只是站在一旁，向总理挥手致意，含泪目送总理进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

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自此，周邓事实上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同盟，周恩来也将邓小平视为自己政治遗产的接班人。

… …

1975年11月2日，在毛泽东听到毛远新汇报邓小平对文革态度抵触的事情后，他希望毛远新等人帮助邓小平“提高”，结果当晚年轻气盛的毛远新直接骂邓小平是在搞修正主义，而后者这次并未冲撞，而是选择检讨。

第二天，毛泽东决定让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做决议，给出一个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
同时提到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对于毛泽东来说，此时的他仍然希望邓小平承认文革的功绩，他并不希望与邓小平决裂。为此他不断的熄火，表示支持“批评的目的不是打倒，而是为了团结”，同时交代会议内容不要告诉江青。

邓小平也意识到毛泽东有些不信任自己，他以退为进主动要求辞去军委总参谋长的职务。 11月20日，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表示这个决议他写不出，因为“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邓小平的说辞想表达自己66年就靠边站了，完全不知道文革发生什么，写不了。这回答在毛泽东眼里是一种抵触态度。

11月底到1976年1月，所谓的帮助邓小平重新认识与评价文革的政治局会议变成了揭发邓小平利用整顿过程中搞翻案。

张春桥事后回忆：“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是坐在椅子上，一支接着一支的抽烟…..他说耳朵聋了，听不见别人发言，可是，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轻轻说了一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拉一下站起来就走了。”

1976年1月21日，清华北大开始批邓。一周后，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给华国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976年1号文件。

9.四五运动—不要文革要改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

在周恩来去世后，官方虽然表面上高度评价，实际上则压制相关报道与热度，压制民间的祭奠活动。在周恩来去世六天内，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

1月11日，十里长街送总理，高级知识分子与干部充斥的北京城内的舆论，继续朝着”不要文革要改革“一边倒。

难道这一次的文革败局已定了吗？许多人心中都有自己小九九：
对于京城内的干部、干部子弟与保守派而言，这场革命就不该出现；
对于造反派而言，十年过去了，工人最终还是没能当家作主；
对于极左派而言，自由人的集合体，民主的巴黎公社在中央的一步步妥协下成了泡影。

不同利益集团和各个阶级的对文革的认识，在十年后逐渐并拢：这场运动已经失败，再继续是纯粹的瞎折腾。

【卷入“四五运动”的人，可以说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的父母作为走资派，都被整得死去活来；其中也有很多造反派，他们的造反造到68年就被镇压了，很多人都成了“五一六”份子，什么现行反革命，也是被整得一塌糊涂，他们也很不满。】——秦晖

对林彪时代以来个人崇拜庸俗化的反感，对宣传单一化下社会压抑的痛恨释放，都以对周恩来的悼念形式表现出来。

… …

【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了《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

【“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

… …

3月25日，《文汇报》报道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引起群众误解，矛盾激化。

【《文汇报》收到的抗议信件、电报达42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

“《文胆”
“《文汇报》的后台是谁？请站出来！人民是不会宽容的！！”

“你们到底是在受谁的指挥？！奉劝你们不要跟着张某人的指挥棒瞎跑！”

“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从3月末开始，南京等城市开始出现民众剧中演讲与朗诵游行，并直接点名的开始攻击四人帮中的人物。

【3月31日，在南京最繁华地段之一的中山东路，一幅巨型标语在一幢六层楼的顶端直泻下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４月２日，南京《捉妖战歌》：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妖为鬼蜮，必显灾情。】【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法家，根本一家。】
【代表利益，剥削阶级，事过千年，远离现实。】
【为其翻案，是何用意？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总理。】
【总理遗志，定能实现，人们所向，共产主义。】

四月开始，以悼念周恩来为名义，群众开始在天安门聚集，他们在这里念诗、骂江青、骂张春桥，甚至讽刺毛泽东。

【4月3日，王洪文亲自前往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照明下扫视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和悼词。随后，王洪文匆匆回程拨通公安部亲信的电话训示道：

“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

同日，天安门广场小雨纷纷，平添几分肃穆气氛。人越聚越多，花圈越摆越大，前来悼念的人已达几十万之众。】

【4月4日，北京市30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７时半，一名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

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10万之众！】

在天安门聚集的除了干部子女、一般群众、保皇派以外还能见到一些造反派和极左派的身影。对文革早期巴黎公社原则仍有向往的极左派们普遍转向对专制主义的反思，甚至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表现的反复而走上怀疑毛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中途妥协，使人民遭到了惨痛的牺牲。”】——前造反派张闯

现在这些人却要与自己当初最大的敌人，那些拥护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整顿的“当权派”、“保守派”、“走资派”们站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讽刺、可笑、悲哀来形容。

【“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你们不念我们念，你们不祭我们祭。总理精神万代传，子子孙孙举红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岗举义旗！”】

群众游行变成了准暴力集会。

在广场上，还有有人莫名其妙喊出要求邓小平出山的口号，因此事后许多人怀疑政府内的人也参与群众运动来炮打文革

【有人在高声诵吟：“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江青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为此，当天邓小平被立即要求叫到政治局，张春桥当众怒骂邓小平就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的纳吉，认定邓小平是这次事件的黑后台。

四月五日晚，天安门开始反复发表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不要上当。”

【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站出来反对游行：“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 ”“这样悼念不好。人一死，送花圈有什么用？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这样的发言很快令其遭到其他示威者的威胁。】

【“第一，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第二，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第三，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毛泽东

4月5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用民兵镇压。第二天，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0.怀仁堂政变，文革结束

【1976年春节，也是毛主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这时候的他，连行走都很困难。除夕夜，生活秘书张玉凤征得主席同意后，为他放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

这个阶段，毛主席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电影的一开头就是解放军入城的画面，毛主席回过头询问保健护士长：“当年上海解放的时候，欢迎解放军的队伍里有你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毛主席转过头突然开始抽泣，接下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哭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听到官方广播后，哭声顿时响彻全国各地。

… …

毛的去世，为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盖起棺材板。

此时的党内政治力量天平几乎是完全倾向官僚，在“四五反革命事件”后，官僚派发现了“文革”与“四人帮”正在失去社会上的民心支持，他们没有枪杆子，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与人脉。

文革派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第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合法手段巩固现有的造反派力量。也因此在毛主席病重前后，江青王洪文等人开始全国范围巡游，拉拢仅存的工人造反派力量。

然而，早在毛主席去世前，官僚们就已经有用非法手段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想法：

【姚依林回忆，他到陈云家送一份关于江青叛徒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琢磨，能不能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他把中央委员的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的力量很大，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四人帮”是没有把握的。

陈云是善于算计的人，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陈云这样的判断。不采取强硬措施是不行的。】

【叶剑英对军队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杨成武、梁必业、粟裕、宋时轮、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

【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

文革派这边同样也对政变有所预感：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信。】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不会甘心失败的，总会有人抬出邓小平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8月间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王洪文

【“如果爸爸死了，你不要难过。”】——姚文元对女儿

… …..

【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

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

爸爸说，这些上海帮（70年代党内对文革派的实际称呼）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
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许世友的儿子

… …

到了九月，华国锋与汪东兴、李先念、叶剑英等人开始密谋政变的具体方案。

【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 ”】

… …

10月6日
以商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入怀仁堂。

王洪文进入怀仁堂后，绕过面前的屏障，眼前是华国锋与叶剑英两人坐在椅子上怒视着他，此外也没有任何椅子和会议桌。

“怎么回事。”王洪文意识到不对，可这时两个解放军已经架住了他，“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华国锋当着王洪文的面，宣读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还没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身后的战士扑向叶剑英，但很快被扑倒架走，在被架走时还略带不甘的嘟囔：“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 ”

… ….

张春桥才刚进入怀仁堂就直接被抓住，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

接着就被行动小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

华国锋对张春桥宣布道：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行动组成员立即把他押到东饮水处，蒋廷贵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 ….

姚文元，他连门都没进，在楼梯上就被战士架住。（因为此时华国锋都走了）
他大喊：小朱快来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

… …

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把他押走了。

… …

警卫进入江青的住所，念诵华国锋的审查令。
江青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淡淡问了句，“是华国锋本人的意思吗？”

张耀祠展示华国锋的签字，江青没再说什么。只是说有重要的档案要交给华国锋，最后他将档案钥匙装入袋子，签上“国峰同志亲启”。

在交给张耀祠后江青走入轿车，随后被隔离审查。

… …

10月7日，中央要求上海革委会主任马天水到北京开紧急会议，马天水到北京后突然失联。

10月8日，上海革委会发现已经无法联系到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徐景贤说：情况很不正常，看来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

【整整两天的恐慌和猜测，现在得到了证实。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勇、张敬标、朱永嘉、萧穆、廖祖康等人都在现场，他们都不得不接受一个严峻的事实：过去经常议论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后来说，他立刻想起了几天前萧穆对张春桥说的话："上海要有大考验了，要打仗了"

“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可能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

… …

【平时话不多的朱永嘉，这时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这次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结合，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就说这几个人反党。”】

【“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样。”】

拉出民兵，举行起义，对新秩序发出最后的冲锋。

【“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

【民兵指挥部的人本来根本不知发生了什麽事情，听王秀珍这一番话，才知道中央发生了大事。】黄金海对市民兵指挥部要求：“发枪吧，我们跟你们一起干”

【宪法上有名文规定的嘛，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就可以造反。】

10月12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已经传遍地下，朱永嘉主张立刻干，向全世界通报中国右派政变。

… ….

在上海造反派内，上海总工会和写作组之前一直是互相看不起的，一直在内斗。

直到最后关头，两派决定握手言和：“过去我们有点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

然而此时一切都晚了，文化大革命大势已去。

就像上海人民公社，就像反复旧，就像批林批孔，就像反右倾翻案….上海起义最终被扼杀在摇篮。

上海，一月革命的圣地。
10月26日，上海民兵高举着华国锋的头像，欢庆着没有四人帮与造反派的新秩序。

____

DLC:胜利者与幸存者的新秩序——后文革时代

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大，宣布了“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在怀仁堂政变后，虽然在1978年的理论务虚会后邓小平才开始掌权。但从1976年开始，以华国峰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已经开始扫清政府内的文革残留。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手段”。

一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代表失败者的政府内造反派与文革派干部进行大清洗——揭批查运动（1976-1980）与清理三种人（1982—1988）

二是对这十年来的“幸存者”们（老干部、知识分子、部分群众）施以怀柔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1.胜利者的狂欢：揭批查与清理三种人

事实上在整场文革中，造反派这一群体在夺权失败后的八年内一直掌握不多的实权，很多时候充当革委会内的精神象征。但对于复职的老干部而言，造反派在文革早期对他们的冲击留下的坏印象远超过镇压。在为期两到四年的揭批查期间，全国共殃及（包括关押、清退、开除职务或党籍、处分降职）接近千万人，许多人被关进了“学习班”。

同样的，揭批查与清理三种人运动实质上延续着之前的运动式镇压模式，只是对象不同，因此扩大化、冤假错案绝对不可避免。

一方面有些地方干部的确是“桃花源中人”，不清楚文革的复杂情况。更多的则是纯粹利用这场运动对造反派进行报复，并打压政敌。
以下为部分案例。

贵州：
【三十六年后当年隔离在相宝山的人回忆，对于个别负阀顽抗、拒不交待罪行的人，也是毫不心慈手软的。比如参加学习班的贵钢造反派头头张大华（省总工会常委），就在会场上被出来，专案组人员用水漫泡的细棕绳将他“苏秦背剑”，一支手从启上往后背下压，一支手从后背往上搜，合绑在背后，两个手臂也被细棕绳绕着。
办案人员大声问：“交不交待？”，张不啤声。
“你不交待？”专案人员一边问，一边用水往背上、手臂上浇，水把棕绳淋湿了，两三分钟后，大家见张大华的脸部、额头慢慢变红，越来越红，最后变成紫色，他两眼一旺，终的一声倒在地上。办案人员才给他松绑。
《》
案组领导就果断宣布升级，戴上手铸，关进监狱！】

武汉：
【1976年11月，武汉市打着“工农兵”（原“百万雄师”继承者）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造反派头面人物，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四人帮”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銀（“钢工总”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朱鸿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钢工总”一号头头、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钢工总”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实行专案审查。 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1982年7月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而比较黑色幽默的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武汉百万雄师内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老工人阶级，作为文革前十七年体制受益者的他们当时选择了保皇。然而到了90年代，许多百万雄师的工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遭遇了下岗，和当初的造反派工人沦落到一个穷困潦倒的地步。

很多前百万雄师工人后来不时感慨：“现在来看你们（造反派）是对的，如果还有下一次文革，我和你们一块造反。”
也许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武汉两派没有根本的阶级矛盾，是可以联合的。到了21世纪，当初的武汉两派不时线下聚会、聚餐，共同怀念过往青春，实现了1967年没能实现的“大和解”。

河南：
根据政府统计，在7年的清查运动中约有十万党员被开除，1700人被判刑，突出判刑2400人，原夺权时代造反派同情者第一书记刘建勋被直接波及。（讽刺的是，刘建勋对造反派反复旧运动采取镇压立场）

张钦礼案：
张钦礼（曾与焦裕禄共事）的后半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文革时代清算文革秩序有多混乱。

在文革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三年饥荒期间大搞浮夸风，造成河南成了三年大饥荒中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并且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芝圃一派在河南利用反右清洗异己，大搞独裁。

张钦礼于是上书中央，让周恩来知道了河南省的严重情况。随后吴芝圃被免职，刘建勋接任省委书记。
在1962年的国民经济经济调整中，张钦礼大力支持焦裕禄整顿生产，平反被错打成右派的干部。

1964年，焦裕禄去世，在同年的四清运动中，张钦礼挨整。但四清工作队的干部秦一飞、周化民没能找到任何证据，因此张钦礼很快被放出。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初，兰考县原本的四清工作队（相当于旧秩序，代表干部为秦一飞、周化民）直接转为地方文革小组，以搞革命的名义对焦裕禄、张钦礼的政治遗产进行报复。给焦裕禄、张钦礼戴上修正主义帽子、反右运动的漏网之鱼，大量焦裕禄系统的干部遭到迫害， 1200多人被逮捕。焦裕禄纪念馆被砸碎，纪念碑被涂掉，张钦礼本人蹲了大半年的监狱。

随后67年，造保攻守易位。周恩来宣布：“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同时河南省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宣布支持造反派，张钦礼本人支持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也声明支持造反派。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内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三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文件。

结果到了1968年，军方大规模介入文革后形势又反转了。河南省卫副书记王新原来是河南军区政委，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成了二把手。

他派到兰考的干部，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理由就是“生产搞的太好”：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

张钦礼被关押后，家里被反复抄家，母亲受不了打击活活气死。他在大别山被关押超过500天，直到林彪摔死了，文革又反转了。

1972年，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他再三追问王新（军方势力）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
王新则被捕，捕前在批斗他的会议上，周恩来指示张钦礼、杨贵必须参加。张钦礼这时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党。

张钦礼不理解的是，他与林彪并不沾边，和王新也不认识。

更为荒唐的是，怀仁堂政变后，在揭批查中张钦礼反而因为老干部复职遭到报复，再加上文革初期确实帮助造反派夺权被抓了起来。政府说他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集团。

【商丘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铁礼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张铁礼一案和“卫焦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张钦礼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时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保守派的秦一飞、周化民。）】

【晚年张钦礼曾经多次表示：我始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
样？】

在文革后，焦裕禄仍被认为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广泛得到宣传，活跃在初中高中的教科书里。但焦裕禄的同事与他的班子却反而在文革中挨整，并在文革后背了迫害别人的锅。

当初最恨焦裕禄的当权派反而戏剧性的被平反。

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焦裕禄》播出，剧里张钦礼这一人物被替换成了一个原创正面人物“张希孟”，这也侧面说明就连中央自己都觉得这是个不好说的故事。

【“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了国共内战八百万人。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
“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胡乱抓人，现在要赶紧放”】——胡耀邦

直到运动后期临近尾声，胡耀邦才试图给揭批查降火，为部分受到不公正待遇客观上也确实没怎么冲击老干部的造反派头目进行平反，如高树华案。

清理三种人：

三种人的官方定义是：跟着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与揭批查一样，实际上是个相当有争议的定义，在实际清理时往往取决于老干部的主观意志。
在清理三种人时对文革早期的红二代组建的老红卫兵往往是不追究的，在陈云的作用下老红卫兵、西纠、联动等组织甚至还被平反。

同样的，在整场文革中杀人最多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实行屠杀的军方高级干部也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除非你明确的跟随林彪、江青以及反对邓小平）

与此同时，在后文革时代为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有时候还要对这些罪行的受害者进行宣传（比如老舍），但又不能点出这些施暴者是谁，只是浅浅的说了句“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同时在人们心中植入“红卫兵=造反派=林彪、江青”的刻板印象。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所谓“老红卫兵”，是指 1966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革，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 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

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革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

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节选孔丹给陈云的信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公安部正式对西纠、联动进行平反：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的“西纠”“联动”是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两个红卫兵组织诬陷为反动组织，是别有用心的。江青在首都万人大会上叫嚣对“西纠”要毫不留情的镇压。他们捏造罪状，在八一学校炮制了所谓“联动”罪行展览，进行诬陷。

1967年在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把“联动”列为反动组织。当时这两个红卫兵组织中被逮捕关押数百人，并追查他们的后台，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为他们全面篡党夺权制造条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各种诬陷和迫害，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对因“西纠”“联动”问题，错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审查的中学红卫兵学生，公安机关应逐人做出平反结论，过去已作了结论、但结论不当的应做改正。平反结论要征求本人意见，存入本人档案，发给所在单位，以清除影响。审查期间形成的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对这两个中学红卫兵组织中“ ” 《 》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处理。】

2.幸存者的春天：平反冤假错案

后文革时代的一句著名口号叫作“团结一致向前看”，然而如果不对先前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实行平反，又怎么能确保人心的团结呢？

虽然诸如老红卫兵、韦国清、滕海清、邓小平、黄永胜、陈再道等客观上在文革时代也犯下罪行的人并未遭到清算，但不属于改开时期当权集团，同时又确实犯下人道主义罪行的许多人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而一些在文革乃至于文革前经常挨批的群众、知识分子、与没能挤入革委会的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被包容进了“春风”里，甚至为了凝聚人心，连1957-1958的反右运动中被戴高帽的知识分子都得到了一定的平反（即使邓小平也是反右运动的执行者）

例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许多死于老红卫兵与军政集权时代的人：

知识分子方面例子：

赵九章：死于清理阶级队伍，拨乱反正时期获得平反，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萧光琰：死于清理阶级队伍，1972年林彪问题复查时得到初步平反，1978年被完全平反。

严凤英：死于清理阶级队伍，1978年被平反，平反前专案组审问革委会军代表为何迫害严凤英，军代表回应称：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呀！

傅雷：1966年死于老红卫兵，1978年被平反，同时撤销1958年错划的右派分子。

老舍（舒庆春）：1966年死于老红卫兵，1978年恢复名誉。

卞仲耘：1966年死于老红卫兵，1978年被平反；然而，政府在为其平反的同时严格堵嘴，不允许其丈夫为其申诉找出凶手。甚至于邓小平的女儿亲自找到其丈夫，威胁以后只能说卞仲耘是在高压下死于心脏病。

在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一位已经于2012年死去的目击证人林莽在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叛徒、工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异议人士、异端造反派平反例子：

对于造反派而言，如果你早早的退出运动，或是因为过于极左冲击林彪系统、冲击中央文革，反而在文革后有可能得到平反。赖在革委会到76 年反而容易被拿去和“四人帮”绑定，蹲局子。

杨曦光（杨小凯）：极左造反派，省无联成员，《中国向何处去》撰稿者。在服刑期间在监狱里跟随被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学习了大学课程，1978年由党内改革自由派李锐父女保释出狱，1983年得到正式平反；

出狱后的杨曦光现名杨小凯，从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自发毛泽东主义、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极左派高中知识分子，变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市场自由化拥护者，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事件：
前文提及，一群大学生自发组织马列主义学习会，认定林彪搞的是法西斯专政。结果13人里的3人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决，4人被关押， 6人被隔离审查和批斗。

1973年在批林批孔中被华国锋要求复查此案，1978年正式平反。

“李一哲”：
异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主张社会主义的法治宪政与民主。“李一哲”实际上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共用笔名。1979年三人被习仲勋宣布平反。

遇罗克：
文革早期造反派，代表作《出身论》，因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认为《出身论》是大毒草而被枪毙，1979年得到平反。

五一六分子：
在文革早期支持造反周恩来国务院的极左派，在被迅速取缔后，历届革委会都经常以清查五一六的名义打压极左派。

“林彪、江青1967年无中生有强行编造出的所谓‘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凡因此名义被抓捕、残害的干部群众，均称五一六分子。”— — 中国大百科（2004）

除了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极左派因为挨“林彪集团这一造反派”的整而得到平反外。拨乱反正时代甚至对部分明确发表过反对毛泽东声音的知名人士也进行了平反。

张志新：
中国共产党员，恪守1956年的八大纲领，反对个人崇拜、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示自己“不理解文革的很多事”，认为对刘少奇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同时反对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之后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在监狱里受尽毒打，被狱卒强奸，在肉体折磨下精神失常。经常在监狱里大喊要“油炸毛泽东”、“对毛泽东千刀万剐”；
1973年批林批孔时期，监狱人员批判林彪犯下极右错误时，张志新突然精神失常大喊：“中国共产党极右总路线的根子是毛泽东！”
之后张志新继续精神失常，经常坐在大小便里。
1975年被执行枪决。
1978年撤销原判，1979年平反。

李九莲：
文革时期在信件中表达对刘少奇的同情与对林彪的不满而被监禁。在1976年未获得平反，同时攻击华国锋是反革命、资产阶级野心家，支持江青和四人帮。
1977年因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华主席被枪毙，1980年被胡耀邦平反。

王申酉：
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持不同态度，主张社会主义下引入商品经济作为补充和对外开放。反对反右运动、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认为毛泽东应该一分为二，说他晚年是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1977年被枪毙。
1981年平反。

元帅、官僚被平反案例：

刘少奇：不写了

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被称为彭、黄、周、张反党集团，在大跃进结束后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政策，被认定为反党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大军阀等。1978年彭德怀平反，1981年四人全部平反。

贺龙：1969年在糖尿病状态下被林彪集团扎入葡萄糖毒害而死，1974年因林彪倒台复查中被部分平反，1982年被彻底平反。

吴芝圃：大跃进时期河南领导人，在其治理下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100万人，没有被追责。但是文革发生后，河南造反派在66年揭发批斗他。
1967年去世
1979年被平反。

李井泉：大跃进时代主政四川，在大饥荒后全省人口统计直接减少（除了饿死还包括病死、一般老死、以及要考虑到饥荒条件下几乎没有人生孩子，外加逃亡外省）一千万。
曾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质疑其“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时回应道：“中国这么大，哪个朝代没有人饿死？”

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家里普遍饿死人的造反派们复仇打倒，全家都挨了造反派的整，其中一个儿子被造反派整死。
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文革后被平反，一度担任中顾委成员，1989年自然去世。

(1)改革开放时期对农村文革大屠杀的复查：

在中国前三十年曾经严格实行农村二元体制，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流通十分困难。这最终导致文革时期农村造反派很难与城市造反派实行跨地域合作。
再加上文革时期本身就逐渐限制红卫兵跨地域建立多省份或者全国性的组织。最终与工人阶级革命闹的如火如茶的城市不同，文革时期的农村许多地区都成功抵御了造反派的“夺权”，黑五类出身的人并没能得到翻身。

而在文革中，农村地区的文革大体上是延续着”血统论“与”林彪系统“，这里个人下一个比较主观的判断： “文革时期农村的状态可能比较符合一些所谓伤痕文学与电视剧里的刻板印象。”

充斥着符号化的个人崇拜、血统出身歧视与贫穷….还有屠杀？

整场文革中，农村地区大约有178万人被杀。与常人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部分被杀的人是死于68年后革委会建立后，被政府冠以各种 “现行反革命”指控而遭枪决，而非死于武斗时期。

但武斗时期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农村大屠杀，最典型还要数广西和广东。

表2.6　按省分類的通報死亡人數在1,000人或以上的縣，死亡人數與縣誌記錄文字長度

省份	縣	死亡人數	長度（字數）
廣東	陽春縣	2,600	6,480
廣西	武鳴縣	2,463	6,114
廣西	桂縣*	2,219	6,280
廣西	全州縣	2,216	7,560
廣東	五華縣	2,136	2,540
廣西	臨桂縣	2,051	5,240
廣東	連江縣	1,851	4,320
廣西	都安瑤族自治縣	1,714	9,320
廣西	天等縣	1,651	960
廣西	陸川縣	1,557	4,760
廣西	羅城仫佬族自治縣	1,425	3,680
廣西	融安縣	1,416	5,520
廣西	梅縣	1,403	5,440
廣西	馬山縣	1,329	9,080
廣西	臨川縣	1,321	5,588
廣西	宜山縣	1,250	9,840
廣東	廣寧縣	1,218	3,560
廣西	柳江縣	1,183	4,600
湖南	寧遠縣	1,093	2,916
內蒙古	科爾沁右翼前旗	1,070	8,640
廣西	崇左縣	1,029	6,000
廣東	連縣	1,019	9,440
廣西	鹿寨縣	1,002	3,920
山東	海陽縣	1,000	2,394

表 2.4　文革期間暴力造成的死傷數字，三省與全國的比較

	各縣的平均死亡人數	各縣的平均受傷人數	各縣的平均迫害目標人數
廣西	574.0	266.4	12,616.0
廣東	311.6	28.1	6,788.6
湖北	10.8	44.5	2,317.5
全國所有的省份	80.0	68.0	5,397.0

表 2.1　縣誌中低估死亡數字的例子

省份	縣	其他來源	縣誌
廣西	賓陽縣[a, b]	死亡：3,951	死亡：40
廣西	蒙山縣[a]	死亡：850	死亡：9
廣西	上林縣[a]	死亡：1,906	死亡：171
廣西	武宣縣[a]	死亡：524	死亡：526
廣西	鍾山縣[a]	死亡：625	死亡：63
湖南	道縣[c]	死亡：4,519	死亡：7
江蘇	太倉縣[d]	死亡：7,500	死亡：2,027
江蘇	定南縣[e]	死亡：7	無人死亡
		受迫害：396	受迫害：144
陝西	華縣[f]	死亡：217	無人死亡
		受迫害：1,929	無人受迫害
陝西	潼關縣[g]	死亡：16+	無人死亡
		受迫害：3,343	受迫害：3,348
山西	昔陽縣[h]	死亡：141	無人死亡
雲南	新平縣[i]	受迫害：22,000	受迫害：9,368

[illegible]

1967[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9000**[illegible]**826**[illegible]**78**[illegible]**10**[illegible]

【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例如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 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
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芤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胡茂昌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13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

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

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

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

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在拨乱反正时期，湖南道县等地的屠杀受害者都得到平反，幸存下来的家属也得到了政府的抚恤金。一些参与屠杀的民兵和党员干部也得到审判。

但是，全省乃至全国参与杀人的村民起码成千上万，如果全部抓起来显然又不能促进“社会弥合”。因此对这种农村地区屠杀只能抓几个带头的。如道县杀死了几千人，可最终被判刑和开除党籍的只有43人，这也造成了许多屠杀幸存者在得到平反后继续上访。

要论文革时期的大屠杀，最知名的还要数广西大屠杀。

广西文革大屠杀始于造反派（422）与保守派（联指）武斗，两派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拥护广西军区司令韦国清。韦国清所在的广西军区偷偷送武器支持联指（保守派），同时将422（造反派）打成“国民党反共复国军”的现行反革命，帮助联指镇压 422，造成十几万人死亡。
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案例：

圖 8.1 1967–1968 年間廣東集體殺戮的地理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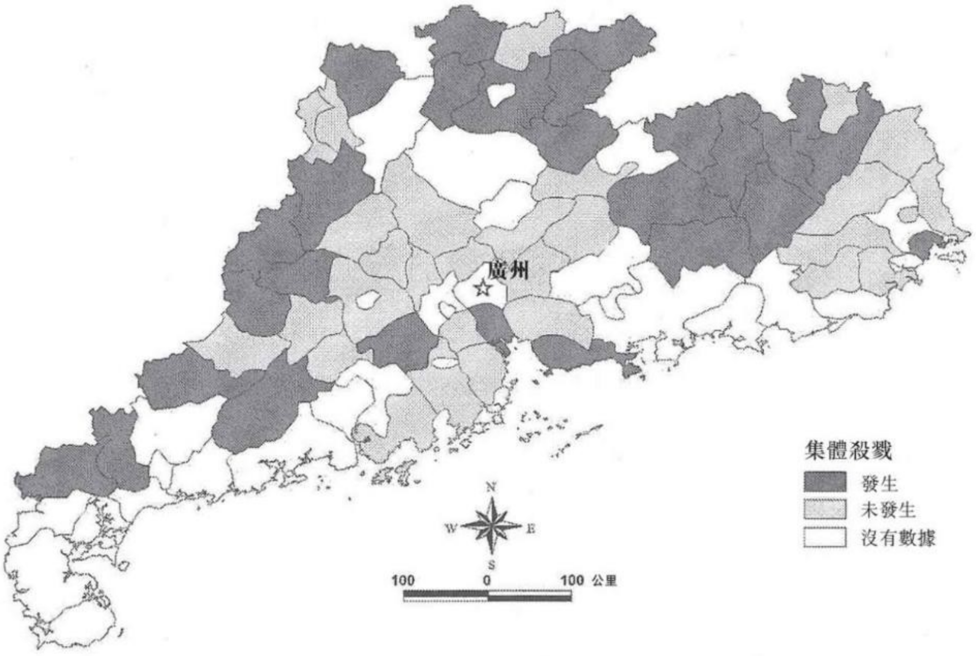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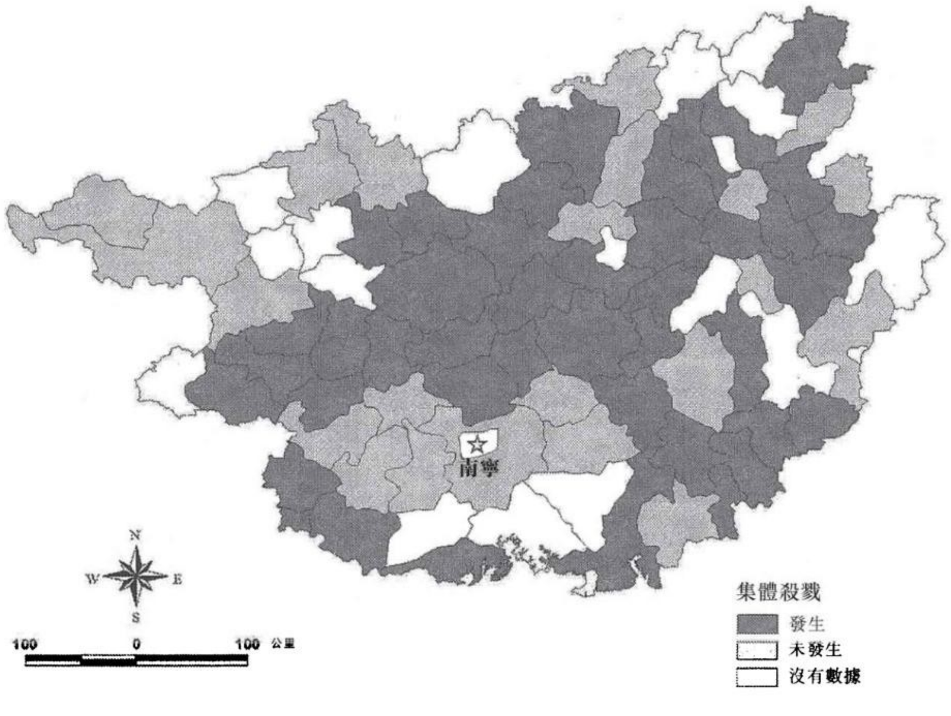


圖 8.2 1967–1968 年間廣西集體殺戮的地理分佈



【在郑义关于广西大屠杀和食人情况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中，提及 M 县是其中一个暴行最为严重的县。

他写到在 M 县的一个村，不仅那些成年的所谓“牛鬼蛇神”被杀，也有年幼的孩子被害。不知情的尚在学步的孩子，边叫著杀人者“伯伯”边请求他不要再用长绳子“逗他玩”。

郑曾经读到一个杀人者的忏悔书：“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

在郑读到的报告中，他发现杀人行为有时取决于性别：男孩会被杀，女孩则会被放过。
杀人者会通过摸孩子们的裤裆来决定。

M县县志中的相关内容这样写道：1968年3月20日晚，新联公社黄桥生产队民兵以镇压“平民党”为由而乱杀人。此后，全县相继出现乱杀现象，尤以文平等地为甚。】

【在1980年代早期，广西省展开大规模的文革调查后不久，政府官员欢迎作家郑义对集体杀戮和食人现象进行调查。根据他之后在海外出版的著作中的描述可以看出郑义得以深入地翻阅内部报告和接触目击者。

在一个案例中，郑义访谈了一位杀人者易晚生，谈话时，他正与其他两位老人打牌。

在一份由县公安局提供的报告中，郑义得知，在1968年5月，易晚生杀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然后肢解了受害者并吃了他的肝脏。

当被郑问起当年的杀人和吃人事件，他变得恼羞成怒，并且毫无悔意地说：“对，我什麽都承认！我反正八十六岁了，反正活够了，还怕坐牢？” 他对为什麽杀死邓姓少年的理由表述得并不算有条理，却不乏自我辩护的意味：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
争！】

【广东省W县杜坑村在1968年7月和8月间共举行了6次群众批斗大会，共杀害了63个男性四类分子及他们家族中的男性后代。

其中一次屠杀中，黄彩桥，一个16岁的地主儿子却没有死。杀人工具一般是各种农具，但并不总是好用。

他醒来之后，杀人者和观众们已经散去，他开始缓慢爬行。他爬到了靠近河边的一所房子，里面住著他叫她“姑妈”的寡妇。他想要一些食物和水。姑妈被他的到访吓坏了，说：“彩桥，姑妈对不起你。我不能帮你，你快走吧，别连累你的表兄弟妹们。”

可能是由于姑妈的出卖，黄彩桥很快便被捕了，第二天又被押送到了同一个河岸。民兵强迫他的表兄，一个贫农的儿子将他处死。一个目击者告诉我，他的表兄拿著锄头，“一直在发抖”。】

【3月16日，天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日，人民武装办公室的总司令号召“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

这一宣言发佈之后，随即在全县发生了190起集体杀戮事件，导致630人被杀。在祥元乡，“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

在1968年3月27至5月22日之间，贵县松英大队的干部覃锡明和他手下的民兵用大棒和锄头杀死了40个无辜的群众。受害者中包括一个未满10个月的婴儿，11名儿童和1个上年纪的盲眼老妇人。13个家庭中的所有男子都遭到了杀害。

1968年4月13日，一群“四二二”派带著一个被联合司令部杀死的孩子的尸体抗议为新成立的贵县革命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大会。抗议以失败告终，政府与联合司令部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并在各个地方公社召开屠杀展示大会，共有128人被杀。】

【城市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本书中所提到的所有屠杀事件都发生在乡镇或村庄，发生在农村居民之中。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量关于大城市的文革研究中未谈及类似的事件。其中包括对发生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杭州的文革事件详尽的大事记，这些论述也都成为了当代研究文革的经典之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地区的集体屠杀》

在拨乱反正时期，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强力推动下，许多这类屠杀行为的受害者都得到平反与补偿，但很显然许多屠杀政策的直接负责人（尤其是高层）并未受到惩罚。（最明显的就是韦国清本人）

据广西县志主编称，1978年三中全会后省里进行的第一波调查并不完整。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当权者无论是省级领导，还是地方干部都是文革的时候提拔过来的。换句话说，整个省全体上下90%的干部都要为此负责，因此他们必然对复查平反敷衍了事。

直到中央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等在1983年直接开始往广西派工作组，对复查进行直接监督，每个县成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小组”，复查进程才开始认真起来。在此期间，当地干部也一直在尝试给复查小组使绊子。

【在1983年他的工作组收集了所有杀人事件的全部现有资料。他所在的县，633人就他们在文革中所承担的责任而接受了调查。结果， 572人受到了惩罚，其中501人为党员。根据调查结果，每一级政府都进行了重组。在M县，819名干部、工人以及农民被认为负有责任。其中，303人被开除党籍；55人被免去了政府职务；29人被定罪，2人被判死刑，1人终身监禁。

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成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领导小组，抽调496名干部参加“处遗’工作，彻底清理“文革”遗留问题，全县共平反各种冤假错案1,263人，对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平反昭雪，给他们的遗属发放埋葬费、抚恤费、房屋修理费及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共27.3万元。】——书籍同上

还乡团与共产党干部的合流：反澎湃烈士事件

凡事皆有例外，并非所有的屠杀都是纯粹针对黑五类分子而来，反澎湃烈士事件就是典型。

澎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革命领导人之一，曾开辟海丰革命根据地，实行激进的土地革命，据说也曾经实行过“红色恐怖”，放任农会对地主实行杀戮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彭湃本人也是个大地主出身，再加上当地有不少在彭湃土地革命时期杀死的地主后代，在当地干部炮制“反澎湃烈士事件”后，部分地主后代也参与了该事件：

彭湃的儿子彭洪被批斗后失踪，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堂侄也遭到屠杀。当地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残废或重伤， 3000多人受轻伤。

【1967年8月26日，海丰“反彭”的几个头目操纵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造谣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枪械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

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彭湃侄儿彭科也在这避难的队伍中。8月29日下午，他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被搜山的一伙人发现。在场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疑似为当初被彭湃杀死的地主后代），听到彭科的名字，立即冲到他跟前，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著篾刀，连砍带割砍下彭科的头颅。

这个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还胁迫一个同样在山上被抓的女干部，将这血淋淋的头颅挂在身上，拿回城去。当晚，彭科的头颅被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后才取下。】

后来在1978年，习仲勋在当地考察，并在1979年主持了对“反澎湃事件”的平反工作：

【1978年7月底习仲勋在汕头地委考察，谈到海丰反彭湃问题时说：

“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事情弄清楚了，民愤很大，平不了民愤的，我再把你关起来。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同广州军区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

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他们通过走访，找到一个曾参与拖尸、埋尸的农民。这个朴实的农民十年前挖坑埋下彭洪的尸体后，顺手在坟裡埋下了一块红砖。

根据这一线索，工作组在当时海丰县中医院（现为海丰彭湃中学）后面的一片荒郊野地下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

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省委、省革委会、汕头地委、地区革委会，都送了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这个追悼大会，为彭家平反雪冤了。”陈平说。

3200多人获平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1979年1月25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对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习仲勋主政广东》

____

正片：
包这么多饺子，只是为了下面一盘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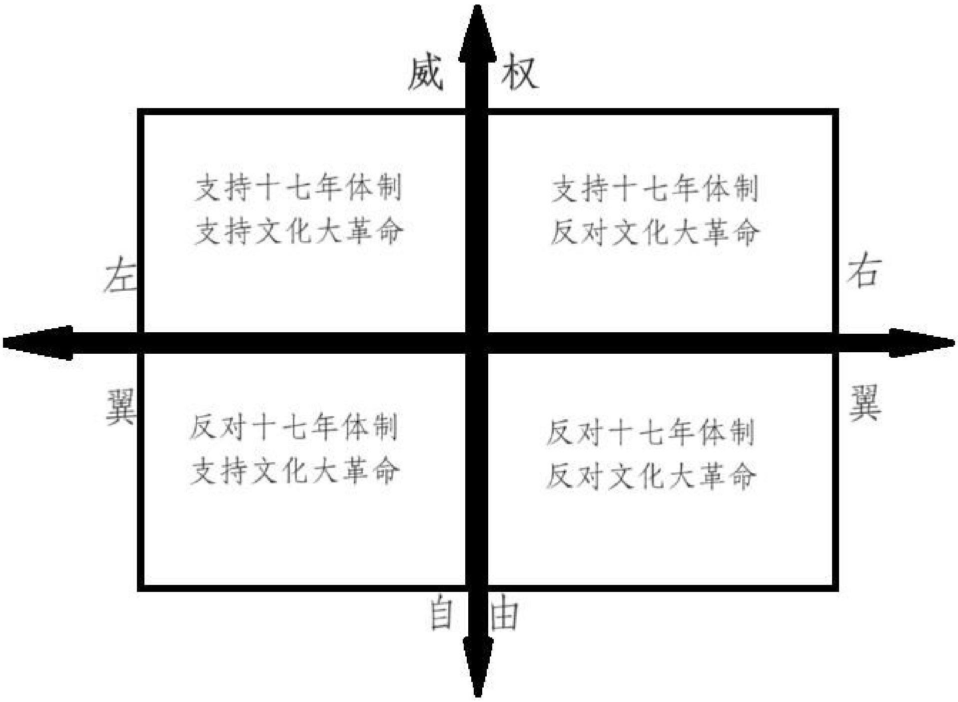
一.极简文革叙事：秦晖的四种文革说

由于文革历史充满着可能涉及到破坏当权者与领袖们光辉形象的禁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一直执行“宜粗不宜细”的文革史观。也就是简单的将文革叙述成成二元的“极左恐怖分子”和“改革者”两条道路的斗争。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加剧，不同的政治观点不断涌现，但所有人都只能在一段裁剪的历史中为各自的真实意识形态寻找合法性并鸡同鸭讲。中国自由派学者秦晖曾经写过一篇《文革的四种叙事》来描述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文革的解读。

可随着近年来披露的史料越来越多，以及所谓“政治光谱”越来越广大，秦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过时。

在秦晖看来，文革叙事可以简化为以下四种：



1.支持前十七年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类人以改革开放后期党内的老左派（或称保守派）和新左派为代表，代表为邓力群、乌有之乡。认为文革与前十七年并无冲突，文革的目的是扫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西方自由派走狗。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长期作为邓小平路线的反对者。

2.支持前十七年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类人包括以党内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老左派（或称保守派），与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

这类人认为中国在 1956 年之前都是功绩，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原则没错，一党专政没错。认为党“变质了”，修正了的文化大革命才是错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的浩劫。

3.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类人以当年的极左造反派（毛主义者）、激进自由派（往往也会滑落到第四种叙事）、左翼反对派（如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构成。其核心观点是经典的：先锋队会腐化，应该用文革实行工人阶级的大民主。

这些的观点和立场有的时候还会与第一种叙事与第四种叙事结合。

4.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类人以文革结束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党内的改革派小圈子（如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构成，认为文革是一场被毛泽东发动，在林彪和江青集团支持下，打压不同异议分子的极权主义浩劫。

全程毫无民主与宪政因素的民粹极权运动。

他们的观点从温和的希望推进政治改革，实行（一党或多党的）民主化，再到整个全面的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如中华民国支持者）都有。

总结：

秦晖的概括比官方叙事下那种二元对立强得多。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致思想的人，所谓的政治光谱只是一种参考。在实际情况下，上述的四种叙事会出现不同的变体与细化。

尤其是在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本身因信息不透明而存在“鸡同鸭讲”现象的情况下，秦晖的观点仍然只能算极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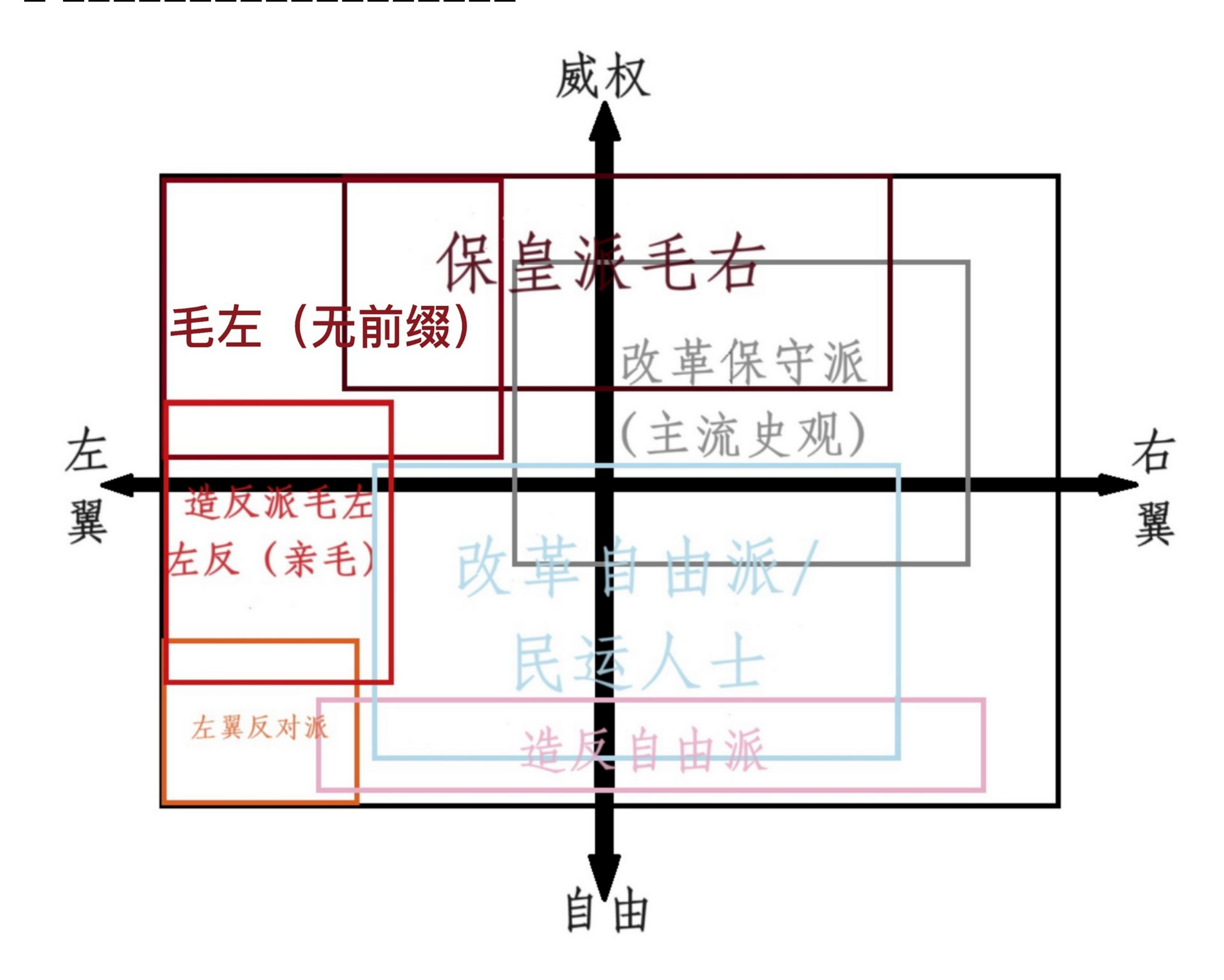
二.新极简文革叙事：本文作者的七种文革说

其实，我本人是极度反对年轻人把政治意识形态标签看得太重，那玩意本质上就是cosplay，如同十年前的“你部落、我联盟”的过家家认同。
人的政治立场是多元的，在具体问题与政策a上保守，b上激进是很常见的情况。

过度的强调：你属于这个派系，你必须或者你应当这样的信仰和立场，否则你应该更改你的意识形态标签。
这只会把政治变成一种排外的亚文化小圈子。

但不得不承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定程度上的梳理与分类的确是有必要的。因此以下内容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互联网现象观察”，而并非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认为的“极简文革叙事分类”通过三个维度来划分：
1.你支持马列主义一党专政，还是认同非一党专政模式下的民主（社或资都可能）政府？
2.你同情造反派还是同情保守派？
3.你认为毛泽东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你支持或反对一个怎样的毛泽东？



第三个问题，是我个人认为在信息时代后最应当加入与进行的讨论。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里到底是什么？

他是中央文革的总后台，他亲自解放受压的造反派并鼓动他们冲击官僚，在1966-1968与1972-1976这两个时间段内，也的确一直在支持、保护与帮助造反派。

但同时，他是“三支两军”政策的制定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镇压造反派运动的发动者。
他也曾经亲自批示一些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并且某种程度上也要为广西大屠杀这样的惨剧背负一定责任。

作为可以被同时认为是“中国最大保皇派”与“中国最大造反派”的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角色定位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

1.左翼反对派：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大的老保！la肉好似！

代表例子：民主社会主义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部分自发毛主义者、部分卢森堡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

这类人的核心观点：
1.反对马列主义先锋队一党专政体制，认为其本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可能】是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还要坏的体制。

2.支持造反派，支持反复旧，支持落实巴黎公社原则，支持省无联、北决扬这样的极左组织。

3.毛泽东才是文化大革命最该打倒的当权派，要想实行直接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拿掉毛独裁的权力。

关注 ···

一个合格的文革保守派，必然符合如下特征：
1.背刺上海公社，背叛十六条，搞法团主义“大联合”
2.清理阶级队伍，但保护老干部
3.借打压“经济主义妖风”和“反复旧”名义进行维稳，取缔独立工会
4.发布“军委八条”，“军委十条”默认军管会斑斑恶行，复辟血统论和出身论

下午12:54 · 2023年12月5日 · **5,047** 查看

关注 ···

5.迫害、取缔异端派思潮，放任清查五一六的“反革命分子”
6.以维稳的名义背叛中央文革派，罢免王关戚
7.发布公安六条，发动一打三反，铸造文字狱
8.对聂核心清洗“小三军”的行为视而不见，导致无数科研工作者惨死
9.煽动民族情绪以转移国内矛盾
10.借“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调和各方，试图平反二月逆流

艾跃进到底是保派还是造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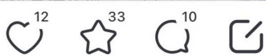
知乎 · 63 个回答 · 77 关注 ›

54 人赞同了该回答

“经典堡早不分。”
分得很清楚，谁默认清查516谁就是堡。
谁把王力撤了，背弃沪工造，谁就是堡。
谁打压反复旧，维护军政极权谁就是堡。
谁害死遇X克，谁把杨X光关起来，谁把北、决、扬封杀谁就是堡。
谁默认清理xx队伍，让军、工宣和重启血统、出身论大搞血腥恐怖，谁就是堡。
谁搞出一打和三反，制造冤案迫害理工知识分子，欺压两弹元勋破坏革命，谁就是堡。
谁在夺权后反对工人罢工，把他们打成经济主义，谁就是堡。
谁建立的有史以来时间最长，最压抑的军政极权时代，谁就是堡。
谁背叛了十六条，说要改组为革委会，谁就是堡。
谁在71年后胆敢平反二月xx，谁就是堡。

不管是谁，只要背叛了继续革命的理念，就算是太阳也要把他浇灭。

编辑于 2023-12-05 07:57 · IP 属地加拿大 · 禁止转载

54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温和一点的如王希哲（分类存在争议）：介于左翼反对派、造反自由派、左反（亲毛）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异端造反派“李一哲”三人中的“哲”，在文革后与另外两人逐渐分道扬镳。参与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西单民主墙”运动。
1980年主张组建反对党。
1981年再次入狱，1993年出狱。虽然“错过”了1989年的天安门学运，但之后的王希哲彻底成为了民运派人士。
1996年双，

王希哲晚年对革命年代的共产党仍然持正面评价，认为共产党自己背叛了革命年代倡导的民主理想，同时王希哲对毛泽东时代也持有中立看法，批评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但又认为前三十年贪污没有之后严重。

因此王希哲应该属于民运派里的左派，他自认为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认为民主问题要优先。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无产阶级的党变成了权贵资本家的党。

… …

现在中国的特点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他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权贵，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都已经转化为资本家。

… …

毛泽东时代官员不管怎么贪污，他贪污的是消费资料，也就是多吃多占，而现在的贪腐是占有资本。过去的共产党号称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共产党全部是大小资本家，越往上越大。
包括现在揭露出来的温家宝，口口声声什么民主啊、改革啊，什么两袖清风，一揭出来都是几十亿、上百亿。他可以说他没有贪，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权势，家属不可能发这个财，这个谁都懂的。

… …

共产党蜕变成权贵资本家的党趋势已不可逆转，就是毛泽东再生，也改变不了共产党。中共不会走老路，倒是真正的在走一条邪路。

… …

邓小平自己都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话，我们就失败了，那就根本走上邪路了。

… …

胡锦涛说，中共既不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要走什么老路，什么是邪路呢？邓小平已经做了定义了，就是中国高度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中国本应产生资产阶级，问题是在于党内资产阶级，共产党官僚资本化了，共产党今天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王希哲

2.造反派毛左/左反（亲毛）：毛主席的本心是造反的，林彪给执行保皇了。

代表例子：造反派毛泽东主义者、自发毛主义者、部分认同民主体制的社会主义者（如一些卢森堡主义者）

核心观点：
1.先锋队是会腐化的，反对马列一党专政。
2.支持造反派，反对官僚与保守派，反对改革开放与邓小平。
3.毛泽东是造反派，他对老保做出妥协是没办法的事。

袁庾华说：“‘太子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右的政治力量，我们称之为大右派。所谓‘太子党’应该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群体，绝不是指所有‘红二代’。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我们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袁庾华自称“永远的造反派”，就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人。

袁庾华说：“总有人对我讲，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派。我承认！但是，要投身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问题四次被捕入狱，每一次的第一个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和反思，几十年的反覆思考，使我更认识到：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让6、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个做主的人。”“20世纪以后，凡是执政的政党，都尽量去适应官僚机器。结果，各个政党都官僚化了，都变质了，其群众性、民主性都逐渐失去。所以说，20世纪应该称为官僚政治的世纪，包括苏联和中国。……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样的威信魄力，在共产党这个官僚集团面前也常常显得无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国家统一的最基本条件(中央的最高权力和军队主体)，把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砸了个稀巴烂，天也没塌下来！西方的官僚主义所受到的制约也是几百年来民众斗争取得的，只是其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远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唯一的致命敌人，就是最广泛的民众组织的斗争。”

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但我认为还不够，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说，把古希腊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左翼群体，也就是造反派，这几十年来在深受了专制的残酷迫害后，普遍渴望民主。而对于大多数有左翼倾向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一时还没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们自己主张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但也同样要求民主。在大陆社会中强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响的广泛的底层毛派群众。大陆民主运动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层毛派的群众运动。当然，仅仅是他们也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

由于造反派毛派从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质（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着‘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导民众‘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义来为修正主义保驾护航！是以搞乱左派思想的手段来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保皇派毛派已经把前者视为自己最危险的对手。张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如果是指共产党，那么他们说对了”），强调要警惕“左右合流”，声称“左右合流的实质是充当汉奸带路党，一旦形成潮流势必要亡党亡国亡百姓”，“左右合流是毛派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在这里，他再次扩大了“汉奸”阵营，给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带路党”的帽子，并说“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难区分清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

他们中的部分认为中国当今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腾讯阿里这样的民营企业，而是被官僚独裁控制的国家资本，因此这类人对自由派的立场实际上要更为温和，他们更讨厌独裁专制。

这类人中个别甚至认同“联帝反修”，也就是联合自由派甚至境外势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修正主义，然后再通过赎买或革命的方式建立大民主体制的社会主义。

同时，也有许多人认同“反修反帝”，也就是把反对官僚资本放在最优先，但同时对自由派与民营企业采取否定与敌对的态度。

而随着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文革历史在国内的传播，也为持有这一立场的年轻人增添了新鲜血液，而年轻人往往认同反帝反修大于联帝反修。

许多年轻的造反派毛左认同巴黎公社原则，认为毛主席一直心向造反派的，只是不得不与官僚军阀进行一些妥协。

“即便是三支两军后，毛主席仍然在和林彪军事集团斗争，这不就是毛主席心向造反派最大的证据吗？”

“造反派毛左”中也存在许多人认同毛存在着一定历史局限性，受制于他所在的位置与思想。但仍然对其表现出高度的敬意和对邓小平的敌视。

还有一部分人即使不相信毛泽东主义，也仍然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愿景有崇高的评价，也会承认这个人物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一些卢森堡主义者、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等等）。

他们在其他社会主义建设原则上可能与真正信仰毛主义的“造反派毛左”有分歧，但在文革的叙事上则高度接近，也因此我将这一群体也归类进来。

同时，“造反派毛左”之中也有部分人反对刚才列举的第一类“左翼反对派”，认为他们这种想要把毛一起造反的想法是“空想”、“纸上谈兵”。

当然，我估计以你此推文表现出的对文革历史认知水平，估计更是完全不知道68年毛转保皇的概念，以及林彪对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期间广西吃人、道县屠杀黑五类，清查516这些历史。

上午9:05 · 2023年12月8日 · **124** 查看

查看 帖子 互动量

4

发布你的回复 回复

· 12月8日

我估计以你推文表现出的对革命运动的无知和纸上谈兵，完全不考虑任何历史背景只会一味空想批评，像托派一样只会搞空想。真打倒了毛让你上，叶剑英邓小平这样的几千年封建残余修成的老狐狸不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学究们懂理论，但不懂中国人，这就是为啥那群废物在412都被屠杀殆尽，毛延续了革命香火

68

· 12月8日

以你的认知水平，连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都认识不到，沉浸在对历史虚无的幻想和假设中。毛自己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到了老年经常以泪洗面。你们这些人，一面喊着不要神化毛，一面真把毛看作是天神下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肆意操弄苍生一样。主观唯心的可笑😄

1 42

@qiwujingpu · 12月8日

仿佛你对文革历史有多深的认知水平一样，720如果毛被保子们直接弄死在武汉东湖，你猜文革还能不能继续进行下去还是立刻转向反动戛然而止？改变得了人民群众沦为美帝经济殖民的韭菜的下场？我相信你心里是有数的，但你不会承认

51

@qiwujingpu · 12月8日

68年以后，军阀们想搞政变想联合起来把毛直接软禁了又不是什么秘密了，差点没把王力活活打死你以为是搞给谁看的？让你一说反动派都跟傻子似的安安静静的任你削藩坐以待毙似的。许世友是跳在前面的，叶剑英这样借刀杀人的阴货还在后面呢。果然还是敲敲键盘骂骂人最容易😄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3.[illegible]

[illegible]b [illegible] up

这类人的核心观点：
1.支持马列主义一党制，反对西方多党制与司法独立、宪政与自由。基本认同“马恩列斯毛”体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与自由化并行，他们也接受“先锋队会腐化”这一观点，同时又认为造反派（68年之前）比保皇派更加保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

2.宣称支持造反派，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不是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通过工人造反来监督特权，清洗党内的不洁之物，在捍卫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

3.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江青同志、林彪同志（九大前）当然是光荣的造反派。

这类人某种角度上也是当今在中国里最为常见的一种毛派，他们部分的接受了邓小平的叙事，只是把这一叙事倒过来。他们认为：林彪（九大前）、江青集团=毛泽东=造反派。

虽然毛派普遍反感邓派史观的正邪立场，但在中国当下压制言论自由与历史讨论的现实下，很难不受到邓派的影响，因此许多人只是将“文革派” 与“改革派”的正邪对调过来。

他们会把武斗期间的“造反派”视为造反派，可同时又会把革委会建立后被林彪、江青迫害的造反派和人民群众视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 ‘保守派’、‘地富反右坏’”。即使这两者很有可能就是同一群人。

例如马列毛大群前段时间还将造反派遇罗克的《出身论》说成大毒草并加以批判。可以看出许多毛左（无前缀）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造反派的依据，仅仅是他们在当时是否得到“四人帮”或林彪集团的认可，而不是取决于他们造不造反。

这点来看，他们与邓小平掌权后的中国政府对文革的认知区别并没有真的那么大。

当然，毛左作为一个大类别，同样可以细分出两大主要分支。

（1）与造反派毛左一定重叠的造反分支：

典型人物：阳和平、水陆洲、部分“乌有之乡（左派）”

也有许多人在具体现实政治立场反而与造反派毛左群体重叠，政治立场更为接近。
例如即便是乌有之乡内也有在2018年声援北大马会，支持平反佳士工运事件、支持独立工会和保障底层民众权益的声音。

再例如b站up阳和平的绝大多数社会议题（包括独立工会、罢工、言论自由、环保、女权主义）都与造反派毛左（乃至西方左翼自由派）一致，采取鼓励与支持的态度。
甚至，阳和平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也认为应该支持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侵略，而并不支持普京政府。

但阳和平、水陆洲等在体制问题上坚定支持一党制，支持三支两军。
他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社会主义多党制。
同时也反对文革时期的极左派，认为极左派是名左实右的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阳和平也曾发表过“广西造反派422被屠杀是因为他们不听中央的话”、“抢劫军火与保守派对抗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支持中央镇压的观点。

总而言之：毛左（无前缀）中与造反派毛左重叠的部分通常支持推翻当下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重上井冈山。
但推翻之后依旧要捍卫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的一党制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2）与保皇派毛右一定重叠的保守分支：

典型人物：张宏良、艾跃进、晚年戚本禹、部分“乌有之乡（右派）”

外交内政方面支持俄罗斯，支持普京，优先仇恨美国。反对西方的放纵自由文化，反对女权运动和性少数。

他们处于毛左毛右叠加态，偏向护党救国，思想有点类似日本北一辉、皇道派和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他们普遍会有一种：“造反派比保皇派更保皇。”，或者也可以说“保皇派比造反派更造反”的看法，事实上还总带有民族布尔什维克倾向。

在他们看来，民营企业与党内自由派分子，以及社会上要求多元化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声音，就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的改革派与自由派是党内的不洁之物。而这些人是当下中国的最重要威胁。

因此这类群体在2022年以前还存在一个亚分支：保习毛左，即认为习近平是毛左，李克强是走资派。要拥护习近平的毛主义司令部打倒李克强，才能复兴毛主义。这类想法的持有者甚至包括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

“（习近平）不说比肩毛主席，赶超普京也可以。”——晚年戚本禹

这些与保皇派毛右有所重叠的毛左（无前缀），经常会被更加激进、倾向政治自由、文化多元的造反派毛左们视为“保皇派”。

这类毛派也会自称造反派，但很多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反而会站在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立场上。

4.保皇派毛右：崽子们别狂，天下还是我们的天下

代表例子：乌有之乡（右派）、薄熙来（后期）、邓力群、陈云民间支持者、华国锋民间支持者、王震。

这类人的核心观点：
1.维护一党专政，不用说！反对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动摇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支持鸟笼经济、计划经济。
2.区分保皇派毛右与毛左（无前缀）的保守分流的重要分界，是看他们对造反派（夺权时期）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前者反对，后者支持。 3.“认为”（至少口头上）毛泽东是“保皇派”的，他只是被江青、林彪这样的“造反派”坏家伙利用了，昏了头。

这类人在改革开放早期成为了政坛上两大主导力量的“保守派集团”。以陈云、邓力群、王震等为代表，他们支持鸟笼经济或计划经济，反对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也反对开放言论与政治改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可动摇。

他们认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好，主张苏联一样的技术官僚专制，反对造反派这种群众运动和“民主”。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共产党确实会腐化，带头搞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不可置疑。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开放后期（也就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开始转向“毛左（无前缀）的保守分支”，只不过认为要借他们自己（而非江青与中央文革）的手来发动属于他们的“造反派”，实现“保皇派毛右”的愿景（如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

就目前来看，“保皇派毛右”实际上正在迅速与“毛左（无前缀）中的保守分支”靠拢、合并，并且越来越少的割裂文革和毛泽东的关系。

5.改革保守派：团结一致向前看

代表例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官方史观

核心观点：
1.支持一党专政，但反对高度极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内（不反对党）支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同市场经济。

2.反对文化大革命，将文化大革命塑造成一种类似“大清洗”、反右运动一样的极权主义浩劫。在他们的叙述里，林彪集团对群众和造反派的屠杀，以及造反派冲击官僚，都是一种“造反派”，因此整场运动的一切都要反对。
但倾向把官僚和知识分子塑造成文革的最大受害者。

3.与保皇派毛右的观点一致：我“认为”（至少口头上）毛泽东是“保皇派”的，他只是被江青、林彪这样的“造反派”坏家伙利用了，昏了头。

我想官方史观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官方史观竭力塑造出一种二元对立：
造反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vs务实派清官与人民群众

官方史观的重点在于宜粗不宜细，将林彪军政时代的“镇压”也视为一种“造反”。混淆“造反”与“镇压”的区别。
在平反受到造反派冲击的官僚的同时，又平反那些被林彪、江青镇压的一些造反派和知识分子，把他们统一描述成文革受害者。

同时对帮助林彪军政时代参与屠杀的军方（如许世友、韦国清、陈再道、滕海清）扮演的角色避而不谈，通过将全部错误丢给已经倒台或者死去的林彪、江青和不存在的造反派，来实现和稀泥式的“大和解”。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改革派对广西文革的清查：当局平反了作为受害者的造反派“422”和黑五类，严惩了参与杀人吃人的广西各级干部与保守派“联指”。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央成立的第一批调查组于1981年前往广西，但在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遇到重重障碍。据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记录：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广西的保皇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2][注 4]。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晏乐斌·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１９８１年４月至６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１９８３年４月至１９８４年１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illegible]“文革”[illegible]

6.[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illegible]

2.[illegible]

3.几乎继承了官方史观，但不同点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是“造反派”，但这个造反派指的其实是官方史观下林彪、江青集团的“罪恶”。

这一史观在推特、YouTube上长期被海内外反共反华网民认同，如王志安、多伦多方脸、李颖等人。与毛左（无前缀）一样，他们的史观恰恰直接来自邓小平时代官方史观的影响，混淆“镇压”与“造反”

这一派叙事约等于在邓派叙事的基础上，宣传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们反对造反派冲击官僚，同时也反对官僚屠杀造反派，并将这些事统一称作 “历史的悲剧”。

这一类群体中不乏存在文革的亲历者，在明知道文革的真实情况后，为了宣传政治改革的观点而继续沿用邓派史观。

如温家宝曾在2012年说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温家宝自己就是个造反派出身的知识分子。温家宝年轻时参加的“地院东方红”组织曾经还揪斗过彭德怀。当然，温家宝本人是较为温和的造反派并过渡到“逍遥派”，因此躲过了文革后的清查。

现如今在中国认同自由民主的自由派也会使用这套史观，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描述成“向文化大革命开倒车”。

7.造反自由派：造反派就是中国的民运

代表例子：秦晖、杨小凯、宋永毅、杨继绳、方方等亲历文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核心观点：
1.支持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宪政与司法独立等西方体制。
2.文革中的造反派被邓小平与当今中国的自由派污名化与刻板印象化了，造反派一直是林彪集团和毛泽东的受害者。
3.毛泽东是保皇派，他在运动早期支持造反派只是为了把造反派作为打倒刘少奇和旧官僚，重新极权的工具。因此在刘少奇被夺权后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派军队镇压。

许多在文革期间参加造反派，并且在文革后开始认同西方自由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有弑父情结的怨恨，认为毛泽东骗了自己，利用了造反派。

例如宋永毅，宋永毅目前客观上是手里文化大革命史料最多的文革历史专家。在他看来毛泽东本身是不相信无产阶级民主的，在文革前毛泽东从来都是嫌弃极权的还不够。

因此毛泽东只是通过十六条的愿景发动和利用造反派冲击已经不听他指挥的刘少奇旧官僚集团，并最终实现他自己的极权。
上述知识分子也会用各种史料，如毛泽东说出的各种话和行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更多是心理学分析，而无决定性证据。

因此这些人同情造反派，但不支持造反派的马克思主义愿景，认为保皇派的毛才是毛泽东真面目。

而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像“李一哲”、“省无联”、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物和组织，敢于反对血统论和政府的专制。

而他们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和之后1989年的民主运动，因此应当把造反派也视为民运先驱。

备注：

秦晖：
中国知名左翼（？）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农村学者，提出过包括“秦制与周制”，“低人权优势”等学说，在中国自由派思想界占据重要位置。

文革时期是广西造反派422成员，广西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形容当时的广西“如同见到了斯大林格勒的战场”。

杨小凯（杨曦光）：
介绍过很多次的人了，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方法与理论”，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

文革时期是极左造反派“省无联”成员，《中国向何处去》撰写者，文革后曾写下回忆：《牛鬼蛇神录》

宋永毅：
美国之音常客，文化大革命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1998年启动《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项目，手里收集了最多的文革原始档案。

文革时期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的异端造反派运动，被关押五年，文革后成了毛泽东的极端反对者。

杨继绳：
持自由派立场的中国当代史学家，热爱在书里念“民主经”。代表作《墓碑》（三年大饥荒题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曾担任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副主编。

文革时期是清华温和造反派“414”成员，414派虽然也是造反派，但主张“造反派不能坐江山”，因此也通常被认为是“造反派里的保守派”。
该派与蒯大富的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团派）发生分裂与武斗。

方方：
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属于文学领域，湖北省作协主席。
在2020年武，“老不死的恨国党公知”。
而她则将每一个质疑她的粉红网民和大v说成“极左”，结果又引发了互联网上左派对她的不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小粉红和建制派应该是极右翼。

文革期间参加了武汉造反派，并写诗歌赞扬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文革结束后曾撰文追忆武汉极左造反派“北决扬”，并宣称：希望能将文革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方　方·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竟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生发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时光。２１岁到３３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没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都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着二十八年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一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仰天长啸〉序》